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

记者马克思

黄斐 (Huang Fei) 著

Marx as Journalist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记者是马克思的第一份职业,也是他一生从事的事业。他如何书写他所置身的 19 世纪人类社会?他对未来抱有何种看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 19 世纪的全球史和新闻传播史为基本历史语境,以马克思新闻活动及新闻书写为素材基础,从角色、文本与思想三个层面切入“记者马克思”。

本书主要创新之一是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新闻工作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马克思理论研究和新闻书写的重点结合起来,以“关键词”的方式对之展开归纳和辨析,由此有助于读者思考和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与所处语境的复杂联动。

本书可供人文社科领域专业人士及所有对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 19 世纪全球史和欧洲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 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马克思/黄斐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12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

ISBN 978-7-302-65002-7

I. ①记… II. ①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44865 号

责任编辑:梁 斐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欧 洋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s://www.tup.com.cn>, <https://www.wqxuetang.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83470000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5mm 印 张:12 插 页:1 字 数:203 千字

版 次: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9.00 元

产品编号:100668-01

一流博士生教育 体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丛书序)^①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是一流大学的底色,体现了学校的传统和特色。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体现出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清华大学正在全面推进综合改革,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立完善的博士生选拔培养机制,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学术精神的培养是博士生教育的根本

学术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者与学术群体在学术活动中坚守的价值准则。大学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反映了一所大学对学术的重视、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功利性目标的摒弃。博士生教育要培养有志于追求学术的人,其根本在于学术精神的培养。

无论古今中外,博士这一称号都和学问、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知识探索密切相关。我国的博士一词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一种学官名。博士任职者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须知识渊博并负有传授学问的职责。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写道:“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后来,人们逐渐把精通某种职业的专门人才称为博士。博士作为一种学位,最早产生于12世纪,最初它是加入教师行会的一种资格证书。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成立,其哲学院取代了以往神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首次产生了由哲学院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并赋予了哲学博士深层次的教育内涵,即推崇学术自由、创造新知识。哲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现代博士生教育的开端,博士则被定义为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具备创造新知识能力的人,是学术精神的传承者和光大者。

^①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2017年12月5日。

博士生学习期间是培养学术精神最重要的阶段。博士生需要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学术活动及博士论文答辩等环节,证明自身的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博士生要培养学术志趣,把对学术的热爱融入生命之中,把捍卫真理作为毕生的追求。博士生更要学会如何面对干扰和诱惑,远离功利,保持安静、从容的心态。学术精神,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学术奉献精神,不仅对博士生未来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对博士生一生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博士生最重要的素质

博士生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包括逻辑推理、言语表达、沟通协作等,但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

学术重视传承,但更看重突破和创新。博士生作为学术事业的后备力量,要立志于追求独创性。独创意味着独立和创造,没有独立精神,往往很难产生创造性的成果。1929年6月3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逝世二周年之际,国学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同为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撰写了碑铭,其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极高评价。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强调要在古今贯通中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努力达到新的高度。博士生应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要求自己,不断创造新的学术成果。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到访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90多名中国学生、学者提出:“独创性是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杨先生主张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有独创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上的独创性变得越来越难,也愈加珍贵和重要。博士生要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性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遵循逻辑规则、不断质疑和反省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勇于挑战自己,敢于挑战权威。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学生特有的弱项,也是我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2001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开展了一项“卡内基博士生教育创新计划”,针对博士生教育进行调研,并发布了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美国和

欧洲,培养学生保持批判而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同行和导师的观点同样非常不容易,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必须成为博士生培养项目的组成部分。

对于博士生而言,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要从如何面对权威开始。为了鼓励学生质疑学术权威、挑战现有学术范式,培养学生的挑战精神和创新能力,清华大学在2013年发起“巅峰对话”,由学生自主邀请各学科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与清华学生同台对话。该活动迄今已经举办了21期,先后邀请17位诺贝尔奖、3位图灵奖、1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参与对话。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Barry Sharpless)在2013年11月来清华参加“巅峰对话”时,对于清华学生的质疑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清华的学生无所畏惧,请原谅我的措辞,但他们真的很有胆量。”这是我听到的对清华学生的最高评价,博士生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更难的一层是要有勇气不断否定自己,有一种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这句名言应该成为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的箴言。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有赖于构建全方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

一流的博士生教育要有一流的教育理念,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把教育理念落实到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

在博士生选拔方面,不能简单按考分录取,而是要侧重评价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知识结构固然重要,但学术志趣和创新潜力更关键,考分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术潜质。清华大学在经过多年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于2016年开始全面实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从原来的按照考试分数招收博士生,转变为按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术潜质招收,并给予院系、学科、导师更大的自主权。《清华大学“申请-审核”制实施办法》明晰了导师和院系在考核、遴选和推荐上的权力和职责,同时确定了规范的流程及监管要求。

在博士生导师资格确认方面,不能论资排辈,更要看重教师的学术活力及研究工作的前沿性。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教师,要让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参与到博士生教育中来。清华大学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博士生导师评定权下放到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允许评聘一部分优秀副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学校在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明确教研系列助理教授可以独立指导博士生,让富有创造活力的青年教师指导优秀的青年学生,师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在促进博士生交流方面,要努力突破学科领域的界限,注重搭建跨学科的平台。跨学科交流是激发博士生学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博士生要努力提升在交叉学科领域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清华大学于2014年创办了“微沙龙”平台,同学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发布学术话题,寻觅学术伙伴。3年来,博士生参与和发起“微沙龙”12 000多场,参与博士生达38 000多人次。“微沙龙”促进了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志趣。清华于2002年创办了博士生论坛,论坛由同学自己组织,师生共同参与。博士生论坛持续举办了500期,开展了18 000多场学术报告,切实起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学科交融、促进交流的作用。学校积极资助博士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交流与合作研究,超过60%的博士生有海外访学经历。清华于2011年设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生项目,鼓励学生到发展中国家亲身体验和调研,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各类问题。

在博士学位评定方面,权力要进一步下放,学术判断应该由各领域的学者来负责。院系二级学术单位应该在评定博士论文水平上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应担负更多的责任。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把学位论文的评审职责授权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评审过程主要由各学位分委员会进行把关,校学位委员会负责学位管理整体工作,负责制度建设和争议事项处理。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是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博士生教育的战略性、引领性作用,面向世界、勇于进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不断推动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迈向新的高度。



清华大学校长
2017年12月

丛书序二

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博士生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的重任,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作为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清华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立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校内实际情况,不断推动博士生教育改革。为了提供适宜博士生成长的学术环境,我校一方面不断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大力推动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我校从多年前就已开始运行一系列博士生培养专项基金和特色项目,激励博士生潜心学术、锐意创新,拓宽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倡导跨学科研究与交流,不断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博士生是最具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新生力量,思维活跃,求真求实。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本领域研究前沿,吸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这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不仅是我校博士生研究工作前沿成果的体现,也是我校博士生学术精神传承和光大的体现。

这套丛书的每一篇论文均来自学校新近每年评选的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了鼓励创新,激励优秀的博士生脱颖而出,同时激励导师悉心指导,我校评选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已有20多年。评选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我校各学科最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为了传播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成果,更好地推动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促进博士生未来发展和成长,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悉心地为每位作者提供专业、细致的写作和出版指导,使这些博士论文以专著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促进了这些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快速广泛传播。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可以为国内外各相关领域或交叉领域的在读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转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感谢丛书作者的导师们。这些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研究到成文,离不开导师的精心指导。我校优秀的师生导学传统,成就了一项项优秀的研究成果,成就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也成就了清华的学术研究。感谢导师们为每篇论文精心撰写序言,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文。

感谢丛书的作者们。他们优秀的学术成果,连同鲜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严谨的学风,都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们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完善,使之在具备科学性、前沿性的同时,更具系统性和可读性。

这套丛书涵盖清华众多学科,从论文的选题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社会发展问题、新兴产业创新等的研究热情,能够感受到作者们的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相信这些年轻作者们勇于承担学术创新重任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感染和带动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将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祝愿丛书的作者们、读者们和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同行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梦想,百折不挠!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和造福人类的事业中不断创新,做新时代的引领者。

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这一本本学术著作的时候,在吸取学术创新成果、享受学术之美的同时,能够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学术奉献精神传播和发扬出去。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18年1月5日

导师序言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前一天,星期六,是我与研究生两周一聚的“沙龙”。其间,黄斐博士提到,她的博士论文《记者马克思》已经纳入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需要导师写篇序言。

黄斐,2011年入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大二时的作业,发表在《青年记者》杂志,后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读书期间的其他荣誉还包括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全国“挑战杯”一等奖、首都“挑战杯”特等奖等。

确定读博时,她曾问我,入学前需要做些什么功课。我说,读读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吧。于是,她潜心数月,啃下四千来页的大部头。然后,发来长长邮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读书多年,第一次遇到如此深刻而通透的思想,名副其实“醍醐灌顶”。

也因此,后来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她欣然接受赵月枝教授的建议,研究记者马克思。论文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答辩通过,并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为了研究记者马克思,2019年黄斐作为全球50名青年之一,获得“德国联邦总理奖学金”,赴德访学一年。她访学期间,一边突击德语,一边踏访伟人行止,请教各路方家,寻觅大小图书馆、档案室,搜集一手资料与文献,对记者马克思做了一次系统考察。

关于马克思与新闻,现有研究大多着眼于新闻思想,以及《莱茵报》《新莱茵报》等办报活动,而几乎不把马克思视为记者,即使偶或谈及,相对其学术生涯与革命生涯也仿佛微不足道。确实,就千年第一思想家而言,记者马克思可以略而不计。而对马克思的一生,以及开天辟地的唯物史观新闻观而言,记者马克思就如串起珍珠项链的丝绳了。在他六十五年的人生中,记者是唯一并一生从事的职业,他的所思所想都离不开记者工作。有似毛泽东一生钟情于两个职业,一是记者,一是教员。

通过黄斐的研究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

系,为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自由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千年梦想到具体实现有了可行路径,而且以敏锐的洞察、深邃的见地、非凡的才情,成为世人难以企及的大记者。在贯穿一生的新闻生涯中,马克思不仅留下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而且写下一大批非同凡响的新闻力作。

今天,我们从记者马克思汲取的营养同马克思主义精髓一脉相承,用列宁的精辟概括来说,记者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体现在记者马克思对新闻的把握上,即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括依据事实描写事实而非依据想象描写事实(如编造人名、地名并美其名曰保护当事人)、在事物的有机运动中揭示真相与本质而非胶柱鼓瑟于孤零零现象以及一个个要素如新闻价值、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革命性体现在记者马克思为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共产党宣言》),而同资本主义旧世界及其新闻业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中。

应该指出,时下有种现象俨然背离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仅仅专注于、着意于科学性一面,忽略甚至回避革命性一面。触目所见的各路文章、著述、论坛、报告等,空谈义理,坐而论道,而对显而易见的矛盾、问题及乱象,或视而不见,或作壁上观,特别是面对着甚嚣尘上的“美新观”,如专业主义、建设性新闻等,不敢、不愿或不善开展伟大斗争。至于“顺着说、围着转、绕着走”的开明绅士两面人,更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两个结合中国化的新闻教育新闻学陷入空转,宛若“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二十大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三个务必”也把伟大斗争提到战略高度。当此时,黄斐的博士论文出版,既对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有所启发,也对新时代新征程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以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了又一学术利器。

李 彬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23年9月4日

序言二

不久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发来黄斐博士的毕业论文《记者马克思：角色、文本与思想》，并说论文即将付梓，嘱我写序。心怀对所有伟人研究者的一份敬意，我随即回复：“我先学习。”读罢论文，我可以笃定地说，“学习”二字绝非虚言。一方面，论文带我重温了马克思的革命生涯（记者生涯）、他的经典论著以及其中闪耀着的思想的光辉，这是常思常悟、常读常新的；另一方面，作为“90后”，黄斐在论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深透了解、精准把握，以及关于“整体地、总体地、系统地看待马克思新闻活动，而非片段性地理解其新闻活动及其价值”的方法论阐发，都令我辈由衷赞叹，感佩莫名。

应当说，有关记者马克思或马克思新闻生涯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也各有千秋，但是黄斐的论文有所不同。令我印象深刻之处有三点：

第一，资料翔实且有新的补充。

相比一般情况下借助二手资料的研究，本书在史料的收集、考证、分析等方面均有突破。作者以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以及欧洲相关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所收集、收录的报刊原件为基础性的研究依据，并使用汉语、英语、德语分别对从事马克思研究、全球史研究的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访谈，从而使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确证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作者还克服困难，实地探访马克思生活、工作的地方，由此获得的知识、信息，引发的思考无疑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基于所能获取的一手资料，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理论著述、笔记手稿、书信往来，特别是其中占比较大却没有得到充分开掘的“新闻文本”的爬梳剔抉，作者以最大努力呈现了“记者马克思”的形象，并使这一形象具有历史真实性。而大量一手资料的补充与运用，使本书的视角与分析框架与众不同，颇有新意。

第二，勾画了认知“记者马克思”的思维导图。

如何在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革命理论家的整体身份

中凸现他作为记者的职业特质并进行系统性研究,需要科学的分析工具。本书创新性地提供了认知“记者马克思”的思维导图。作者从马克思作为报刊撰稿人和管理者的新闻实践出发,以其新闻书写的原始文本为参照,将马克思重要的新闻工作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莱茵报》时期、《新莱茵报》时期和《纽约论坛报》时期。如果说“三阶段论”尚属学界共识的话,那么,本书作者的特殊贡献在于: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供稿的20种报刊的名称、地理分布范围以及时空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由此得出马克思报刊活动经历了由本土到欧洲直至全球(世界性)的过程;其次,对1842年至1875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文章发表的高峰期,峰值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莱茵报》时期)。这充分表明,革命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均成为马克思关注及书写的重点。这一具有动态特征的思维导图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联系、发展地看待“记者马克思”,准确把握其新闻文本背后的思维逻辑和历史逻辑。

第三,揭示了马克思新闻工作与其理论著述之间的深刻关联。

如果说,对于“记者马克思”形象的梳理还属于史料、史实基础上的直观呈现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新闻工作与其理论建树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就属于较深层次的论证、研究了。在这方面,作者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

书中有关二者关联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首先,马克思的新闻工作作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来源和事实依据,所举实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社会贫困问题,促使他的关注重心由纯政治问题转向政治经济问题,使他逐渐形成唯物史观,走向了社会主义。另一个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即,马克思在新闻工作中掌握了大量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得出过度杠杆化是经济危机之起源的结论。而《资本论》中的许多案例都来自马克思在新闻工作中的积累。其次,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参与了“宏大理论”的建构过程,与其大部头著作一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更多关注社会理论;在《新莱茵报》时期,更多关注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理论;在《纽约论坛报》时期,则更多关注国家理论和殖民理论,等等。在马克思那里,记者工作与理论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新闻作品(包括调查类作品)为其理论研究做了充分准备,而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理论则直接融入他的每一篇新闻作品中。

有了这种关联性分析,“记者马克思”就不再是由资料的简单堆积而组装起来的虚幻影像,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真问题”,“记者马克思

思”的形象也因此丰满。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行分析研读的同时,作者亦关联当今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启人思悟、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对于“记者马克思”的研究,可能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复合型”新闻记者的意义——记者不仅仅是专业主义法则规训下的职业人员,也可以是有机知识分子,还可以是以变革为目标,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为志向的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为记者开创了一个可能的新的角色选择,在“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专业记者之外,他们还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更加多面手的、灵活的、理性的知识分子或是政治活动家。应当说,这既是问题,又是答案。

值得称道的是,此书既是研究“记者马克思”的学术专著,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论证的一部优秀研究成果。我为青年学者的这种信念、勇气和迎难而上的精神点赞。祝贺大作出版,希望黄斐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掘,不断精进,推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是为序。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23年8月21日

摘 要

本书从历史、文本、理论三个层次切入“记者马克思”这一对象，力求在一手史料、新近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与时代问题的基础上，描画出一幅立体图像，以便更好地走近和理解“作为记者的马克思”其人、其事、其时代、其角色、其文本、其思想。

马克思一生都在从事与新闻有关的工作，他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记者。他与恩格斯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题材丰富，文笔生动，意义深远。笔者采用历史研究、文本分析、调查走访等方法，通过爬梳一手资料，以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作为参考素材进行研究。本书勾勒出马克思三段重要的新闻工作经历，包括作为激进主义撰稿人的《莱茵报》时期、作为社会主义舆论家的《新莱茵报》时期、作为国际主义观察家的《纽约论坛报》时期，并以19世纪全球史和新闻史为历史语境，对记者马克思的角色、新闻工作方法、习惯以及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理论层面，本书分析了马克思新闻工作与其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唯物史观发展脉络的紧密互动关系，并着重分析在三个主要新闻工作阶段中马克思所遇到的三组紧张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张力、劳动与资本的张力、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张力。文本分析层面，本书以马克思有关中国的一组典型文章作为案例，探讨了马克思的新闻书写在19世纪全球殖民主义的政经体系与舆论生态中所体现的例外性。此外，本书还以马克思写作的人物、历史、事件等类型的新闻文本为基础，分析了马克思新闻书写的文学旨趣与政治行动主义指向。依据历史、文本、理论层面的分析，本书归纳出马克思新闻书写文本的四重价值——历史价值、研究价值、美学价值与公共价值。

总的来说，新闻工作作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以及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进步性发展提供了动力因素。从记者这一职业序列上看，马克思

的编辑思想、新闻理念、文学造诣和政治追求,为反思时代性困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将我们推向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关键词: 马克思; 记者; 19 世纪; 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

Abstract

This book explores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Karl Marx as a journalist from a historical, textu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rawing upon primary sources, recent scholarly research, Marxist theories, and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nquiries, the book aims to provide a vivid portrayal of Karl Marx as a journalist. It seeks to enable readers to access and understand Marx himself, his activities, the era in which he lived, his roles, his writings, and his thoughts.

Marx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journalism, beginning with his first job after completing his doctoral studies. Together with Engels, he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rious newspaper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mak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is research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historical analysis, contextual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studies to collect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utilize original text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source for textual analysis is the MEGA 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I) edited by scholars from the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book summarizes Marx's journalistic engagement in three main phases: his time at the *Rheinische Zeitung* as a progressive writer,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as a socialist spin doctor, and hi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observer with the *New York Tribune*. Situated in the global history and journalism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work delves into discussions about Marx's roles,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and articles.

This book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rx's jour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hilosophy. It identifies three sets of tensional concepts: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labor and capital,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Furthermore, the book specifically examines and discusses a series of articles with a focus on China to highlight the uniqueness of Marx's views in the 19th global colonial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and public sphere.

The book takes various types of Marx's articles as objects of case studies, including his writings on notable figure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pecific political issues. It analyz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 journalistic writings, literary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actions. By integrating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analysis, the book identifies four areas in which Marx's journalism carries implications: historical analysis, research, aesthetics, and public policy.

Overall, journalism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driving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activism. Marx's perspectives on editing, publishing, journalism, literature, and his pursuit of political ideals can be seen as a source for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a range of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fering multiple possibilities for shaping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Karl Marx; Journalist; 19th centu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Economy

目 录

插图和附表清单	21
第 1 章 绪论	1
1.1 记者马克思小传	1
1.2 为何研究：马克思在中国	3
1.3 研究什么：有关“记者马克思”的文献回顾	7
1.3.1 历史：马克思的新闻生涯	7
1.3.2 文本：马克思的新闻作品	13
1.3.3 理论：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及其他	16
1.3.4 理论框架	18
1.4 如何研究：记者马克思的角色、文本和思想	20
1.4.1 研究问题	20
1.4.2 研究方法	21
1.4.3 研究思路	22
1.4.4 研究创新	23
第 2 章 记者马克思与 19 世纪	25
2.1 革命、资本、帝国：19 世纪的关键词	25
2.2 报纸、记者、政论：19 世纪的新闻传播	27
2.3 记者马克思及其新闻书写的时空特征	30
2.4 本章小结	33
第 3 章 激进主义撰稿人：《莱茵报》时期	35
3.1 历史语境：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	37
3.1.1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朋友圈”	37
3.1.2 德国莱茵地区与记者作为“普遍”职业	39

3.1.3	《莱茵报》的创立与发行	40
3.2	关键框架：国家与市民社会	41
3.2.1	核心关切：贫困问题——黑格尔的“苦恼”与马克思的“难事”	41
3.2.2	文本分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42
3.3	哲学转向：为《莱茵报》工作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历程	45
3.4	本章小结	50
第4章	社会主义舆论家：《新莱茵报》时期	51
4.1	历史语境：欧洲的1848时刻	51
4.1.1	政治经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	53
4.1.2	思想潮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	53
4.1.3	新闻传播：德国的政治新闻元年	53
4.2	横向比较：工人运动与报刊活动	54
4.3	新闻实践：《新莱茵报》与主编马克思	57
4.3.1	《新莱茵报》的编辑与发行	61
4.3.2	作为报刊主编和革命者的马克思	63
4.4	关键框架：劳动与资本	66
4.5	本章小结	71
第5章	国际主义观察家：《纽约论坛报》时期	73
5.1	历史语境：美国的激进文化与《纽约论坛报》	73
5.1.1	思想潮流：空想社会主义与“1848年人”在美国	73
5.1.2	《纽约论坛报》与《新美国百科全书》	77
5.2	新闻实践：新闻书写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	83
5.2.1	与美国中心主义辩论：批判凯里政治经济学	83
5.2.2	新闻工作作为研究提供事实细节	86
5.3	关键框架：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92
5.4	本章小结	96
第6章	“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新闻作品分析	98
6.1	引论：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吗？	98

6.2	马克思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作品	100
6.3	马克思书写中国的舆论和理论背景	103
6.3.1	19世纪的“媒介化中国”	103
6.3.2	马克思书写中国的思想背景	104
6.3.3	马克思在理论文章、书信中有关亚洲的论述	104
6.4	话语系统：马克思如何报道中国	106
6.4.1	置换的“文明”与“野蛮”：中英两国形象	106
6.4.2	自东向西的革命辩证法	110
6.4.3	中国作为一种另类模式	111
6.5	媒介批评：马克思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	112
6.6	本章小结	115
第7章	结语	117
7.1	角色：作为记者的马克思	118
7.1.1	超越专业主义	118
7.1.2	马克思的形象	124
7.2	文本：马克思新闻作品的四重价值	128
7.2.1	历史价值——思辨性	128
7.2.2	研究价值——理论性	131
7.2.3	美学价值——文学性	133
7.2.4	公共价值——批判性	140
7.3	思想：解释与改变世界	142
7.3.1	历史语境与关键框架	142
7.3.2	马克思论新闻媒介	146
7.3.3	国际主义时刻：马克思与林肯的通信	150
7.4	结语与展望	152
	参考文献	154
	后记	167

插图和附表清单

图 1-1	研究思路导图	22
图 2-1	马恩报刊文章数量统计	32
图 3-1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1—1843 年)	38
图 3-2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3—1845 年,巴黎)	47
图 3-3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5—1848 年,布鲁塞尔)	49
图 4-1	《新莱茵报》马恩所著文章标题关键词	66
图 4-2	《新莱茵报》最后一期首页	71
图 5-1	《纽约每日论坛报》1858 年 9 月 20 日第四版	81
图 6-1	《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占比(%) (1785—2013 年)	103
图 6-2	《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数量(1785—2013 年)	103
图 7-1	马克思的剪报	119
图 7-2	马克思编制的调查表前两页,载于 1880 年 4 月 20 日 《社会主义评论》	123
图 7-3	1879 年 1 月 5 日《芝加哥论坛报》刊载对马克思的访谈	125
图 7-4	部分刊载马克思逝世消息的美国报刊	127
表 1-1	哲学思考和新闻实践中的四种“主观性”概念	15
表 3-1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43
表 4-1	1848 年革命时期德国政治报刊与工会行动派别比较	57
表 4-2	同期德国主要报刊发行量一览	62
表 5-1	《纽约论坛报》系列报刊发行量一览	78
表 6-1	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发表的有关中国的部分文章 及使用材料	101
表 7-1	马克思三阶段新闻经历总结	143

第1章 绪论

1.1 记者马克思小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年5月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特里尔市(Trier)的一个中产家庭。马克思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即为记者。马克思在高中时期写下《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思考》,视界开阔,气势非凡。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读书,与海涅等结为好友,而后中道转学至柏林大学,关注领域从法学转向哲学和历史。黑格尔哲学盛极一时,在柏林读书的马克思亦深受影响,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著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受限于政治环境,1841年自耶拿大学博士毕业后,马克思未能如愿找到教职,便踏入新闻界,为激进派报刊《莱茵报》撰稿。不久后,他成为报纸实际的主笔和主编,广泛结识当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由于1843年《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查封,马克思遂流亡巴黎,流亡期间与老友卢格共同经营、编辑《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被迫停刊后马克思开始在《前进报!》(*Vorwärts!*)发表文章。这一时期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论较为系统的批判。

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进行了第二次会面,志趣相投、相谈甚欢,结下一生友谊。之后,马克思辗转布鲁塞尔,不久重返巴黎,接触了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阅读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此期间,马克思写作了《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1847年马克思与蒲鲁东(Proudhon)的争论非常著名,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回应和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同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于伦敦成立,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成为其领导人物。1848年两人共同写作《共产党宣言》,奏响共产主义事业的序曲。

恰逢1848年欧洲革命,马恩回到旧战场——科隆,占领《新莱茵报》阵

地,集结新闻团队,立志复兴《莱茵报》之革命精神。《新莱茵报》是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平台与舆论领地,时事评论、政策倡导和行动引领是它的三大使命。此时马克思还兼任科隆工人协会的主要负责人。1849年科隆当局查封《新莱茵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最后一期,而后马克思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先是回到巴黎,而后辗转来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此后的生命时光。《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还出版过为期近一年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旨在为欧洲革命的基本情况做出理论阐释和总结。马克思也通过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等移居美国的德裔共产主义者、激进派人士在美国出版和发表文章,例如魏德迈帮助马克思在《革命》(*The Revolution*)杂志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作品。此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的分裂日趋严重,最终在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后被解散。

1851年马克思开始了一份驻外通讯员的工作,与《纽约论坛报》^①开启了长达约10年的合作,马克思贡献了近500篇英文文章。此时马克思开始接触大量的世界性话题,也掌握了英文写作的能力。在此期间,马克思也为其他同情工人阶级的报刊如《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新闻报》(*Die Presse*)等撰写文章。马克思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学习、研究、读报、查找资料,尤其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的梳理和研究,1857—1859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成为马克思后来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的第一稿。马克思仅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后两卷由恩格斯编辑完成。《资本论》中大量的案例来自马克思新闻工作的观察和积累。马克思也是重要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家,在作为报刊编辑的同时,他也曾多次担任地方工人协会(如科隆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自1864年在伦敦成立到1876年在美国宣布解散,马克思都是主要的领袖,在此期间他还支持了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还是当时两大工人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和德国工人协会俱乐部(*Vereinstag der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的理论影响者,如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脱胎于“这两个政党的变体”,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会从马克思这里寻找思想源流的原因。1875年马克思完成《哥达纲领批判》这篇

^① 《纽约论坛报》包括《纽约每日论坛报》《纽约每周论坛报》等一系列报刊,在第5章将有详细介绍。本书统一以《纽约论坛报》做简称。

重要的理论著作,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思考、写作、辩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闻工作者,记者是贯穿其一生的重要角色。

1.2 为何研究：马克思在中国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向东漫游,在幅员辽阔、内忧外患的中国驻足,与这片土地上热忱勇敢的仁人志士相遇相知。无数怀抱共产主义理念的人们,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在全球来看,“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千千万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者的共享称谓。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也激活了许多重要领域的现实实践和理论辩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作为世纪伟人、千年第一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献数不胜数,由其命名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也成为一个世纪多以来诸多国家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纲领。从谷歌搜索热度上来看,马克思排在思想家序列中的前几名,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2017)说道:“如果你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谷歌进行搜索,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只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他,但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而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获得现如今的热度,霍布斯鲍姆继续说道:“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卡尔·马克思都葬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墓地,两人都还在世时,斯宾塞被认为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还在依靠朋友的救助金生活;而如今,似乎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墓碑的对面葬着斯宾塞。”

当前的世界似乎比以往更迫切需要马克思。全球经济震荡、环境危机、公地悲剧、财富分配不公、新冠肺炎疫情……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正考验着各国制度的韧性,政客、学者开始呼唤“马克思归来”,希望寻回马克思的思想内核,以找到诸多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的解决之道。2018年正值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恩所著《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社会变革者以各种方式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个重要时刻。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百余年,世界格局沧海桑田,而他的《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在21世纪,资本与劳动矛盾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均衡的权力分配体系依旧承袭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传统。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广袤的东方世界、在19世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找到

了落地的土壤，成为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行动纲领。2018年，中国政府赠送给马克思的出生地德国特里尔市一尊马克思铜像，引来大批中国游客前去拜谒。而作为马恩的“祖国”，德国也非常珍视马恩留下的思想遗产，2020年正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他的故乡伍珀塔尔(Wuppertal)策划了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如吟诗、读书会、城市游览、辩论会、主题研讨、电影、访谈，等等。

放在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脉络上看，马克思主义历经风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96)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说道：“马克思主义在柏林墙的第一块砖石松动之前就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首先开始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是苏维埃世界的内向爆破，而是日益加速的西方世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如今已在各个领域日趋加剧，并以多样的方式展开。如何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历和遭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长远的、连续的过程，并且需要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马克思本人所处的时空环境做出分析和判断。

马克思的重要性已经难以被时间、空间、政治、学术研究等范畴框定。他的挚友恩格斯评价道：“马克思是天才，而‘我们’至多是能手。”马克思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走的图书馆”，他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数学、自然地理等方面均有探索或贡献。阅读和理解马克思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正因为他超时空地发挥着思想和政策影响，又因为他本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历曲折而丰富，我们有必要去分析“何以是马克思”，这要求我们深入马克思成长、生活、工作的环境中展开研究。如今已有颇多研究关注马克思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然而有关马克思作为记者的行动、思想脉络，其记者生涯与其他角色如学者、思想家、政治行动者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目前系统性的成果较少。学界应对“记者马克思”留下的文本给予更多的注意力。故而，本研究将“作为记者的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观察马克思在19世纪和此后历史进程中的角色、文本和思想议程，以冀丰富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讨论，同时为新闻传播学理论提供历史、文本和思想素材。

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范畴中，尽管有时马克思会被实证主义者或持不同政见者推至学科舞台的边缘，但马克思和他的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小觑——无论是马克思文本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或是其学说对批判传播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启发，抑或他对于世界边缘地带追求自我解放而言

的理论、实践和符号意义。在中国,理解马克思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必修课,对“记者马克思”的研究将为诸多理论命题和实践工作带来新思路。一方面,新闻事业是马克思生命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本,他本人的实践经历也可能指向某一种特别的记者类型。另一方面,这一研究的必要工作也包括理解马克思新闻工作、新闻思想、新闻观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从而有助于我们立足当下、立足中国,书写和发展新时代的“新闻学”。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发展性和实践性(胡钰、虞鑫,2016)。根据恩格斯的回忆,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70年代末曾经在法国广泛传播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时曾说过,“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以不同的形式至少出现过三次。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尽可能地回到原点,以原典为基础,将马克思置于历史语境中,避免教条、空洞和僵化解释马克思及其理论。正如李彬(2019)所说,回到马克思,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亲近马克思,破除种种神话、童话、鬼话。

本研究将从马克思作为报刊(如《莱茵报》《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纽约论坛报》等)撰稿人和编辑时的新闻实践经历出发,以其新闻书写文本为基础,以19世纪的全球史和新闻史为言说环境,发掘和探讨几个尚未被完整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是什么样的记者?马克思怎样做记者?马克思的新闻书写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价值?马克思如何书写他的时代?其新闻实践、新闻思想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思想体系的内在关联是怎样的?其新闻活动在19世纪全球史、全球新闻传播史中的关键位置,及对当下新闻学、新闻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何在?笔者将采用一纵一横的方式观察和研究马克思的记者生涯:一纵,即按照时间序列采集原始素材,基于一手资料分析马克思作为记者的活动和思想阐发,以及其思想的变化轨迹;一横,将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置于19世纪全球史、全球传播史、德国传播史,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理解马克思新闻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当下全球传播的启发。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本研究的价值如下:第一,整体地、总体地、系统地去看待马克思的新闻活动,而非片断性地理解其新闻活动及其价值;第二,深入地、联系实际地对待马克思

^① 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0页。

留下的文本,依据一手史料,挖掘马克思新闻作品中尚未被认真讨论的内容,梳理其新闻书写与思想演进的逻辑、其新闻文本与理论文本之间的关联。

作为记者,马克思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广泛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编辑促进会在柏林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①,马克思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成就得到了充分肯定(罗尔夫·黑克尔、金建,2011)。而他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也被德国媒体公认为重要的学者和记者。记者是马克思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一生中唯一有报酬的正式职业。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精辟概括了马克思革命生涯中的几个重要舆论阵地:《莱茵报》(1842年,科隆),《前进报》(1844年,巴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布鲁塞尔),《新莱茵报》(1848—1849年,科隆),《纽约每日论坛报》(1851—1862年,纽约)。作为主编、记者的马克思,以政论文、研究型文章为载体向时代发出呼告,与不同流派的思想、意识形态展开辩论和斗争,可以说马克思的新闻工作是其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认为最具学术价值的马克思传记的作者,哲学家、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新闻工作:“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和政论文,作为一种新闻形态,是超越时代的。马克思‘写新闻’的方式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事件、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而非行动者自身提供的明确动机,抑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或政策的社会价值。他的新闻报道比他的理论著作更生动地展示了他的自然主义、尖锐、不信任、道德怀疑的态度,与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或多或少带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态度之间的差异。”^②(Berlin,1996)

^①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外学者讲坛”系列第29期:关于MEGA研究的新成果,http://www.sohu.com/a/153131444_768623.

^②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原文:“Such pieces of social analysis and polemic pleased the American public no less than Marx’s dry and ironical articles on foreign affairs. The articles were well informed, shrewd and detached in tone; they showed no particular power of prescience, nor were there any attempt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ffairs as a whole; as a commentary on events they were less candid and less interesting than the letters which their author wrote to Engels at this period, but as journalism they were in advance of their time. Marx’s method was to present his readers with a brief sketch of events or characters, emphasising hidden interests and the sinister activities likely to result from them rather than the explicit motives furnished by the actors themselves, or the social value of this or that measure or policy. His journalism exhibits more vividly than his theoretical writing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naturalistic, acid, distrustful, ethically skeptical attitude, and that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more or less humanitarian and idealistic social historians and critics of his time.”

对马克思本人在新闻实践、新闻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梳理、分析,从而理解“记者马克思”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有必要扎入 19 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充分了解马克思本人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社会活动经历,联系与其紧密互动的时代精神、历史事件、风流人物和思想潮流,对马克思的新闻实践、文本与思想进行深入讨论。从事马克思研究也需要我们摆脱“学术框架”的束缚。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方法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底色,以政治变革为目标,是某种具有“另类”和“超越”特征的新闻实践与书写模式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以《资本论》为集大成体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旨在批判、超越当时流行的“国民经济学”;在历史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与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展开论辩,发展出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新闻实践与新闻书写方面则具有强烈的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倾向,这与 19 世纪末期在美国开始盛行的“客观性新闻”和“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学。马克思为记者们开创了一类传统——在成为从事客观新闻报道的专业记者之外,他们还可以有丰富的、多样的担当,成为更加多面手的、灵活的、更具理论造诣的知识分子或政治活动家。本研究将马克思置于 19 世纪的历史环境中,梳理马克思一生几个主要阶段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其新闻书写文本和文本形成过程为重要资料,辅以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从而描画出更为立体的“记者马克思”形象。当然,“记者马克思”并不会停留在 19 世纪,他还将提示、推动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新闻活动以及新闻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记者角色等众多议题进行反思。

1.3 研究什么:有关“记者马克思”的文献回顾

“记者马克思”这一话题辐射甚广,它可以带动我们对历史、文学、政治、社会主义理论、新闻学理论等诸多问题进行考察。笔者在历史、文本、理论等几个层面展开文献梳理和回顾,并归纳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1.3.1 历史:马克思的新闻生涯

国内以马克思新闻活动为对象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以下几类:(1)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活动进行集合和整理;(2)收集和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学术范畴;(3)对于马克思从事报刊工作时的哲学思想转向进行分析,将新闻工作与其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相勾连,认为办报经历是促进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现实要素(郑保

卫,2018;辛锋、王俊勇,2018)。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新闻思想与报刊思想,相关学理化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周俊(2019)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70年(1949—2019)》一文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做了清晰梳理。197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简称新闻所)出版的期刊,如《新闻研究资料》《新闻法通讯》,以及新闻所与中国新闻学会联合出版的《新闻学刊》等都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文章。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社科院新闻所和北京新闻学会举办“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收录了较多相关文章。这段时期的论文大多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例如陈力丹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即针对“马克思早期新闻思想”展开分析。这一领域重要的著述包括童兵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等。

笔者将中文文献中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或是“马克思的新闻经历或新闻思想”的研究分为两大类,并提炼出其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一类是对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研究。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将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划分为两个阶段:青年时期的“人民报刊”思想,以及较晚时期的“党报思想”。郑保卫(1992)撰文阐释了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与党报思想之间的紧密关联和发展逻辑。这一讨论中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马克思“新闻自由”思想。徐梦菡、李彬(2020)结合历史语境和马克思个人语境,深入分析了马克思早期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指出马克思“新闻自由”理念的时代性,批判了“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文本阐释倾向。另一类研究则就马克思具体的报刊活动展开考证和分析,例如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主编时期、为《纽约论坛报》撰稿时期参与的新闻工作等;或是就某一篇马克思的新闻作品进行讨论。新近的研究如郑保卫、童兵(2019)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陈力丹组织编译的德文原版《新莱茵报》等都为我们走近马克思、走进文本提供了可能。沈荟等(2020)对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了考证,对文章主题进行了分类,认为马克思的新闻书写构成了一种勾连时空之意义地图的“学术性新闻”。

最为系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工程来自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组织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II, MEGA 2*)。相较第一版,MEGA 2收录了更多马恩的文章,并根据丰富的史

料对马恩文章的产生、流变、修改、发表和出版情况进行考证,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著作、《资本论》及其文稿、书信、笔记等。有关MEGA 2的基本情况可参考赵玉兰(2013)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和发展轨迹探源》。由此,MEGA 2的不同卷次和辅助书籍(apparat)为我们开展有关马克思具体的新闻作品文本的分析和考证提供了重要参考。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进行考证,可主要参考第I部分(Abteilung)第7卷;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及其考证则收录于第I部分第16卷等。笔者联系到了勃兰登堡研究院MEGA 2研究组组长格拉尔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博士、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博士等相关专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寻找、收集一手资料和关键文献。当下,中央编译局正在以MEGA 2为主要参照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计划编译70卷,截至2021年8月共编译出版31卷。^①

恩格斯于1877年写作、1878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②回顾了马克思求学、新闻工作、学术研究、政治活动的经历,其中《莱茵报》《新莱茵报》《纽约论坛报》等报刊是马克思革命工作的重要阵地,恩格斯也强调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贡献。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的词条“卡尔·马克思”,完整全面地展现了马克思一生革命、研究和探索的旅程,一方面更加注重马克思作为“革命导师”的历史角色,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马克思理论的诸多面向。

对“记者马克思”的生平经历、思想历程进行全景式扫描的文献来自不同版本、各有千秋的马克思传记。著名的有德国记者、理论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与理论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弗兰茨·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弗朗西斯·维恩(Francis Wheen)等人的著作,近期有美国学者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Karl Marx: A Nineteenth Century Life*),以及德国研究者威尔弗里德·尼佩(Wilfried Nippel)的《马克思传》(*Karl Marx*)等。

弗兰茨·梅林是第一个为马克思作传记的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

^① 根据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的访谈。

^②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15-125页。

写作此传记的目的之一,如序言中所说,是要“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此外这本书也承载着政治使命,鼓舞社会民主党人像马克思那样去战斗。书中,梅林用了较多笔墨描述马克思的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马克思革命时期的经历,以及马恩的友谊。

以赛亚·伯林 1939 年出版的“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以马克思的个人故事、理论观点为素材和底板,进行个性化解读,传递了自由多元论的哲学主张。他自如轻松地分析、辨识了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学者、流派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这本传记更加注重阐释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其理论影响力,并对马克思作为记者所作出的贡献赞赏有加。

戴维·麦克莱伦是伯林的博士生,其所著的《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与伯林的版本可以形成一组参照。麦克莱伦的研究进路和观察视角与其导师有所不同,这本传记以马克思一生的地理轨迹为主轴,分析了马克思在各个停留的城市中的生活经历、从事的革命事业和当时的时代风貌等。其中,有关马克思新闻实践的集中论述分别出现在第一部分(特里尔、波恩和柏林)、第四部分(科伦^①)和第五部分(伦敦)。

自由主义左派记者弗朗西斯·维恩自然对马克思的新闻记者经历更为敏感,他对马克思的“雄辩、大胆和创造力”赞叹不已。与学者出身的其他作者相比,维恩在 1999 年出版的《马克思传》(*Karl Marx*^②)笔调狡黠活泼,增加了大量的场景性、画面性的描述,每一章节都以一种“动物”为题,引人入胜、轻松亲切地将马克思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对这本传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维恩版的马克思传忽略了“马克思的生命推动力——政治信仰”(王宏伟,2001),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讨论。

乔纳森·斯珀伯在 2013 年出版的传记一度被推到相关图书畅销榜的第一位,在西方学者看来,他的贡献在于将马克思拉回到 19 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一种“去魅”的工作。这本书将马克思不同的角色身份作为章节标题,例如:儿子、学生、编辑、革命者、流亡者、观察家、经济学家等,分为三大部分——成长、斗争、遗产(shaping, struggle, legacy)。斯珀伯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讨论,尤其照顾到了马克思与其时代的互动关系。不过这种历

① 科伦即科隆,下同。

② 此书由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的专家 Gerald Hubmann 推荐。

史讲述方法也有将马克思与当代的相关性减弱之嫌,读者在“解码”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陷入“去政治”的泥淖之中。

加雷斯·斯特德曼·约内斯(Gareth Stedman Jones)2016年出版的《马克思:伟大与幻象》(*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将马克思放置于18、19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环境中,文笔生动,描述细腻,在精心处理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流派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对马克思及其参考、批判和发展的理论进行了辨析,在挖掘“是什么”之外,构建了一套致力于解释“为什么是马克思”以及“何以是马克思”的叙述体系。

威尔弗里德·尼佩(Wilfried Nippel)2018年版本的“马克思传”^①短小精悍,用凝练的德语总结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轨迹和政治活动事迹,主要突出马克思在新闻工作、共产主义政治活动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着重分析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作品、著作及政治实践,有关马克思新闻活动的描述散见于不同章节。

以上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传记在政治思想、研究进路、记述风格上各具特色。在事实性素材方面,笔者将充分利用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辨别。

除了各有千秋的马克思传,另有一部重要著作值得重视,即《边缘地带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2010)]。作者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en, 2010)通过分析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其中较多是来源于《纽约论坛报》时期的新闻作品,强调了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程。安德森的理论贡献为笔者指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由德国论证出版社(Argument Verlag)出版的《记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新莱茵报〉为例》(*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2005-Die Journalisten Marx und Engels; Das Beispiel 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一本重要的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围绕《新莱茵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工作展开了研究。其中,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 2006)以政治记者马克思为题、米夏埃尔·克拉特卡(Michael Krätke, 2006)以经济记者马克思为题论述了记者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经历及其在理论、实践等方面的贡献。赫雷斯(2006)分析了马克思作为政治记者的主要实践经历和时代特征,主要聚焦马克思三段主要新闻经历(《莱茵报》《新莱茵报》和《纽

^① 此书由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的专家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推荐。

约论坛报》时期)以及第一国际期间的政治出版活动,高度评价了政治记者马克思的贡献,并指出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特色是尊重事实(Münkler, 2005)——马克思付出大量时间查找和分析资料,将多重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议题分析与判断。

在学术论文方面,以“记者马克思”为主题的研究体量并不大。西班牙学者马里奥·埃斯皮诺萨·皮诺(Mario Espinoza Pino, 2014)认为以马克思新闻作品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意义重大。他将马克思一生的新闻工作经历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国际意义。库尔斯(Kurz, 2014)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活动还远未被广泛理解,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期间对美国问题十分关注,他意识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轨迹和特征有所不同,这成为《资本论》没能最终完成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些论文阐述和分析了马克思新闻作品的风格,笔者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回顾和归纳。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界)对马克思新闻工作的研究在系统性、理论性方面尚有进步空间,我们有必要对“记者马克思”进行完整、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认识到其思想变迁过程的内在逻辑和连贯性,以及新闻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2012)所言,目前学界还要着力研究两个层面上的马克思:一是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马克思,即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的理论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二是新闻实践层面的马克思,即对“作为记者马克思”的研究,目前有关第二个层面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基于此,本书展开论述的重要着力点将包括以下内容:联系马克思同时期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环境,以及当时此起彼伏的、复杂多样的理论论辩,对马克思新闻作品及内在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

以“记者马克思”为研究对象时,我们首先需要将其置于同辈新闻记者的序列中进行考察,同时也要注意三个基本的社会历史环境。第一,19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是不平衡的,19世纪后建立起的维也纳体系标志着欧洲新均势体系的建立,以欧洲为重心的世界格局一直持续到“一战”,而马克思本人的成长、工作和革命生涯深深嵌于这一“欧洲中心”或者“西方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第二,人类生产力水平在工业革命、大机器时代大大提升,与之同步的是底层人民的加速赤贫化,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萌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确立并逐渐发展到垄断阶段,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第三,电报等通信技术便利了世界各国的沟

通与交流,新闻事业开始蓬勃发展。

1.3.2 文本:马克思的新闻作品

“如果撇开大量的新闻通讯——主要是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闻通讯稿——不谈,在马克思生前,马恩实际上只发表了少量的著作”,霍布斯鲍姆(2017d)¹⁸⁰说道。由此可见,新闻作品几乎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讨论和观点传播最重要的内容载体。在文本层面,本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是马克思的新闻风格是怎么样的?或者透过文本来观察,马克思是什么类型的记者?第二是对新闻作品的文学讨论。就马克思的新闻风格而言,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批判性记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20)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构建更加公正秩序的十四条意义,其中一条即“马克思是批判性新闻记者和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楷模”。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反映了“概念新闻学”(conceptual journalism)或是“学术新闻学”(academic journalism)属性(Robi Chakravorti,1993),马克思的语言多姿多彩、活泼生动、充满画面感。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政治专栏作家的“先锋”,他的政治专栏文章展示了哲学式的、分析式的写作风格。马克思在莱茵地区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则更具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的特征。而查尔斯·布利策(Charles Blitzer,1966)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国新闻写作》(*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一书的介绍中称马克思为“现代政治新闻”之父,马克思“注重分析政治问题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挖掘政府、政客的说辞背后的真正动机”^①。

^① 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 Engels. A Selection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Edited by Henry. M. Christman,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6. Introduction; p xxviii, “In an age when men generally were all too ready to accept at face value politician’s own explanations of their acts and motives, it was no mean achievement to suggest—with evidence—that the truth is often much more complex and much less creditable to those in high places. In an age when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of world affairs tended to be almost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the comings and goings of kings and prime ministers, of presidents and party leaders, it took a man of real genius to reveal the enormous economic influence of basic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upon political events. If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politics and a determination to uncover the real motives that lie behind the words of politicians and governments, are the hallmarks of modern political journalism, Karl Marx may properly be said to be its father.”

第三种观点强调马克思新闻作品的“煽情性”(sensational),如菲-亚历山德拉·阿斯(Fee-Alexandra Haase,2009)认为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多属特稿写作,是一种调查性新闻,具有阐释性,注重历史分析。“马克思将新闻当作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一点也解释了其作品历史性的一面。”她引用了莱德贝特(Ledbetter)的观点——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并不能被视为今天的“新闻报道”——没有第一手信息,没有开展访谈工作等。针对马克思新闻写作的特点,莱德贝特(Ledbetter)论述道,马克思通常会选取一个事件,将其压缩为一个政治学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新闻写作和20世纪政治新闻(特别是在欧洲范围)之间的联系,即聚焦公共事务的倾向性写作。马克思在其新闻书写中展开了对国际事务的分析,这些论述中浮现出两组地域性的对立概念:一是欧洲与其他地区;二是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马克思往往会分析事件发展过程中行动与反应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新闻作品中马克思使用的术语与其哲学学术术语是一致的。在菲-亚历山德拉·阿斯(Fee-Alexandra Hasse)看来,马克思是“舆论导向专家”(spindoctor),新闻工作可以被认为是他为所在政治组织开展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活动。马克思新闻写作的素材来源于各类报纸,马克思还曾将《泰晤士报》(*The Times*)称为“英国报纸的利维坦”(The leviathan of the English press)。

也有研究者将记者马克思放在“新闻主观性”的理论光谱中进行探讨。施特恩·斯滕森(Steen Steensen,2017)分析了看似站在新闻“客观性”对立面的新闻“主观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基础及与之匹配的新闻报道实践的特征。如表1-1所示(笔者将其英文表达翻译为中文表达),施特恩·斯滕森(Steen Steensen,2017)将主观性分为了四类:道德主观性、政治主观性、存在主义主观性、破碎的主观性。道德主观性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普遍主义,代表的新闻实践包括现实主义的报道、基于案例的报道、小报新闻;政治主观性的哲学基础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群体性”主观主义,具体的新闻实践表现为党派新闻和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存在主义的主观性新闻则表现为现代主义的新闻报道和新新闻学;破碎的主观性以后结构主义为哲学基础,社交媒体和案例驱动的新闻则是其具体的新闻实践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普遍主义属于宏观(macro)的普遍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主观主义属于中观(meso)的普遍主义;后两者则属于微观(micro)

的普遍主义。

表 1-1 哲学思考和新闻实践中的四种“主观性”概念^①

	道德主观性	政治主观性	存在主义主观性	破碎的主观性
哲学思考	康德的普遍主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群体主观性	存在主义	后结构主义
新闻实践	现实主义报道、案例新闻、小报新闻学	党派新闻、倡导新闻学	现代主义报道、新新闻主义	社交媒体新闻学、案例新闻

威尔弗里德·尼佩(Wilfried Nippel, 2018)⁸¹ 在其写作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书中强调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新闻学”,马克思的新闻评论与分析创造了对外政治、内部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问题的联结纽带。

也有学者从发展新闻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吉·尚夫·贝格尔(Guy Gough Berger, 2003)仿照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以“贫困的新闻和新闻的贫困”为题目对当下“国际发展”类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诊断——这些报道没有意识到贫困问题的根源,从而也难以提出消除贫困的方案。

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马克思拒绝乏味平庸和陈词滥调,他常引用伏尔泰的句子,“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他熟读古希腊文学作品,如荷马、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的作品;他对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熟稔于心。“在一次征询表中,他写到自己最崇敬的三位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他掌握多门语言,一生中笔耕不辍,不断学习新的语言与文化。他旁征博引,在新闻作品中灵活借用莎士比亚戏剧、《浮士德》等作品中的典故、人物形象等,评论、反思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人物。现实生活中,马克思有很多文学家朋友:在波恩时期他与著名诗人海涅结下友谊;《新莱茵报》时期与马克思共事的斐·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则是当时德国影响力数一数二的作家。有关马克思一生的经历及其与文学、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参考牛津大学教授柏拉威尔(S. S. Prawer)的著作《马克思和世界文学》(*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① 表格翻译自 Steensen(2017)的论文。

1.3.3 理论：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及其他

在理论部分,我们需要梳理马克思的重点学说,也要弄清楚马克思之后的诸多流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由马克思开启的批判研究传统,如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02)说道:“如果不回到马克思,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不从他思索的起点开始,严肃的历史探讨是不可能存在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是进入马克思新闻文本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本书展开理论分析的第一个重要层面,即哲学和史观层面。而新闻观和史观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李彬,2018)。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书写新闻即书写历史的第一步骤。“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如此说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说“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在马恩看来,历史书写和新闻书写并不是几个数字、几个数量关系可以描画清楚的,而是需要作者深入故事背后,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机制。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马克思的新闻书写也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新闻作品凝聚了以下方面的努力:对人类历史的学理性积累和探索,对社会现状的扎实调查,对各路学说、思潮的分析研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学习,等等。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割裂的、片面的、机械的新闻书写。理解唯物史观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写新闻”,例如,马克思支持去殖民化运动、支持美国废奴运动,他认为这些努力对工人阶级解放具有关键意义;又如,马克思批判地看待“限制工作时间”这一政策,指出其内部的问题——“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②。马克思很多中后期的新闻作品围绕资本与劳动、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展开。麦克内利说道:“唯物主义史观一直反对意识、思想、观念形态脱离劳动、社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21页。

^②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8-335页。

会生产——人的一切实践活动。”^①马克思新闻书写的关键概念、框架和思想无不落实在劳动层面,因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论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

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理解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是一种不仅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可以创造超出自身价值,即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不断地积累剩余价值,劳动力在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一刻便已经被商品化了。在积极、合理、批判地吸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劳动日的长度,剩余劳动时间由此增加,从而生产更多绝对剩余价值;而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则将制造相对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家转化为利润,但劳动者没有因此获得报酬,于是沦为工资奴隶,劳动异化由此出现。^②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 2017)计算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经济时代仍然有重要价值。显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讨论都围绕剩余价值理论展开。劳动价值论也是马克思新闻工作,或是“新闻侦探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直接为我们揭开了“资本温情脉脉的面纱”。劳动价值论不仅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有关经济问题的新闻作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分析、判断政治议题时使用的政治经济分析方式及其内在逻辑。

在文本分析层面,马克思后诸多流派的**媒介理论和文学理论**值得注意。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96)在他和德鲁·米尔内(Drew Milne)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个读本》(*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一书序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对各种“后”思潮进行了批判式的分析,更加强调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个个体的一摞著作,而是属于一个更广大的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曾经牵涉跨越国家和世纪的千千万万男男女女,许多人以非凡的勇气投身其中,许多人还准备为之付出生命”。简言之,在进行文本

^① 戴维·麦克内利:《语言、历史与阶级斗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davidmnelly.htm>.

^②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29-158页。

分析的时候,我们需要切实关注文本与意识形态、与社会劳动、与现实中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活泼联系。

“记者马克思”也将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记者身份与角色定位问题。在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当下,社会劳动分工愈加精密,记者的能动范围却愈发狭窄。“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一直是马克思对自己、对周遭友人和对全人类的期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理想工作状态——“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对“记者马克思”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复合型”新闻记者的意义:记者不仅仅是专业主义法则规训下的职业人员,他也可以是有机关知识分子,可以是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为志向、为目标的全面发展的人。

1.3.4 理论框架

唯物史观是本研究宏观的、纲领性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发展是贯穿马克思新闻实践的主要理论和思想脉络,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三段主要新闻经历的核心议题和关键框架。笔者主要借鉴了昆汀·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Skinner,1969,2002)的研究进路,相较于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思路,历史语境主义期待研究者将文本言论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知识背景联系起来,从而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历史语境主义主要的分析对象是‘概念’而非‘观念’”(张晒,2013)。笔者受这一思路的启发,尝试将马克思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文本放置于动态的历史和社会制度框架中、放置于其所生活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环境中进行考察,而非悬置在一摞摞文本、一个个抽象的概念中。此外,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范本,笔者将致力于挖掘记者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新闻书写中所关注、处理的“关键框架”,即主要的矛盾或紧张关系。

伴随新闻写作与理论发展的历程,记者马克思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和多种观念思想丛林中开启了几个重要概念的发现之旅,主要在发现历史、发现劳动和发现帝国三个层面。这里所谓发现历史,即唯物史观的确立,也就是确认历史发展中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地位,将历史从“天上拽到地上”、将历史书写的权力从帝王手中还回人民手中的过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充分体会到普鲁士政治体制的压抑性,了解到莱茵省贫困农民困窘的生活状况,马克思给出的方案“报刊自由”,是为了捋顺国家与市民的关系。马克思此时的“自由观念”植根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思想脉络与黑格尔哲学体系。

而《莱茵报》期间的报刊活动促使马克思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马克思将精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着力探索和解释劳动与资本这一对矛盾概念。这一过程被概括为发现“劳动”的过程——他关注到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关系及与之相关的阶级问题,这一发现之旅凸显于《新莱茵报》时期,并伴随马克思的一生。在马克思从事《纽约论坛报》驻外记者工作时,对于国别问题和世界问题的关注,使他开始书写帝国的故事——有关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张力成为一组显性议题。

本研究将在三个层面展开和推进:在时间序列和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刻画记者马克思的生命轨迹和思想轨迹,记述马克思与时代、人物、事件、知识、思潮、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话;从文本的角度看,马克思留下的具体篇章为我们观察记者马克思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之互动关系提供了依托;第三条隐形的故事线则是对于马克思和他所代表的某一种类型的新闻学叙事理论意涵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破解“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新闻作品中的交叠映像。由此,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与物质环境以及意识形态之间搭建起关系与意义之网。具体来说,对“记者马克思”的研究,将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第一,思想层面,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充分理解是分析马克思新闻书写的重要基础。唯物史观是“记者马克思”作品的思想底色。剩余价值论是“记者马克思”进行批判分析、解答重重迷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利器。同时,这两个主要的“理论创见”与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经历息息相关,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经验直接促成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相关理论又深深嵌于具体的新闻书写中。

第二,文本层面,文本的内容及意义与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马克思留下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文本:理论著作如《资本论》、笔记手稿如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与友人的书信来往等,再就是占比很大却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新闻报刊文章——这些文本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新闻文本的掌握和研究既可以帮助我们刻画“记者马克思”的形象,又可以帮助我们提炼出马克思对于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以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紧密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分析马克思理论主张的演进逻辑。

第三,角色层面,“记者马克思”有着多样的担当:学术研究、探索揭秘、政治批判、理论阐释,等等,他也是现实劳动、意识形态辩论的积极参与者。从新闻工作的类别上看,他几乎是全能的存在:他是报刊的撰稿人、编辑、

驻外记者；他也担任过报刊的主编和经营管理者。从地域范畴来看，马克思经历了从地方记者到欧洲记者，再到国际记者的成长历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记者角色的变化与马克思新闻书写内容、理论、思想以及时代的变迁都有重要联系。

1.4 如何研究：记者马克思的角色、文本和思想

1.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他是如何做记者的？他与同时期的记者比较有什么样的特点？他对他的时代和未来抱有何种看法和观点？他为何著书立说？实践层面的考察将包括以下几点：马克思如何选题、立意、收集资料、开展调研工作、论战、进行外部联络和报刊经营等；文本层面，对马克思新闻作品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包括文章数量、空间分布、话题分布等。

第二，文本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本研究将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分析马克思新闻作品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和逻辑。在个体层面，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经历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具体而言，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与其新闻书写有怎样的互动关系？为探究这些问题，笔者将深入马克思的新闻文本，勾连新闻文本与政治活动及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作，分析新闻经历本身对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作用。宏观来看，马克思的新闻文本与19世纪的意识形态有何联系？在不同阶段，马克思新闻书写的核心命题和关键框架又是什么？雷蒙·威廉斯(2005)的“关键词”研究对笔者有着重要启发，本研究尝试联系记者马克思与其历史语境和时代命题，分析马克思新闻文本所涉及的关键框架。

第三，全球史与全球新闻传播史问题。有关记者马克思的故事组成了19世纪新闻史的重要篇章。马克思作为一位“国际记者”，促成了怎样的新闻事业与新闻理论的变革？跨越大西洋的新闻实践对沟通欧洲与美国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而马克思也曾对遥远的东方发表见解，这给当下新闻传播全球秩序的构建会带来怎样的启发？

1.4.2 研究方法

第一,历史研究。本研究涉及对19世纪全球史、全球新闻传播史、德国新闻传播史的梳理和考察,这些分析将为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活动提供一个基本环境。历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主要使用档案研究和史料爬梳等方法,尝试勾勒出19世纪德国和欧美的新闻业态和主要社会思潮,搜集和整理马克思新闻活动的档案,并选取三个历史切片,即1842—1843年、1848—1849年、19世纪50—60年代,研究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经历。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一是由于学界在马克思新闻工作“三阶段论”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二是因为这三段时间在马克思的新闻生涯中有着相当“重要性”的权重(发表量是一个基本衡量指标,将在下文展开)。本书将以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作品的原始文本(主要以德文、英文文本为主)为基准,辅以相应的中文译文进行分析,以冀描绘出一个立体的记者马克思。

第二,文本分析。聚焦马克思的新闻作品进行深度探讨,选取典型文章展开解读,以提炼马克思新闻书写的体例和风格。文本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生动的联系,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可以被认为是推进和贯通马克思思想进程和革命实践的重要行动单元。从文本生成的逻辑上看,马克思的新闻书写与理论书写相伴相生,新闻作品构成了其理论著作的素材来源,同时又是其理论应用与传播的阵地。本书将以一组典型的文章——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新闻作品为案例,分析马克思的新闻书写及理论指向与时代精神、舆论环境的互动关系。

第三,访谈法与实地调查。笔者联系到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 2)的编辑与研究专家,从事有关马克思研究、全球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央编译局专家进行深度访谈,也通过参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组织的读书会,以及恩格斯故乡伍珀塔尔(Wuppertal)举办的恩格斯200周年纪念活动等,丰富对该主题的理解与认识。此外,实地考察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采集途径,笔者拜谒了马克思特里尔故居博物馆,位于科隆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旧址,马克思在英国读书、研究、写作的地方——大英博物馆,马克思在伦敦的故居,马克思的长眠之地海格特墓地(Highgate Cemetery);走访了马克思就读的波恩大学、柏林大学(现柏林洪堡大学)等。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与历史的物质载体及历史书写者的接触帮助笔者获得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感性认识。

1.4.3 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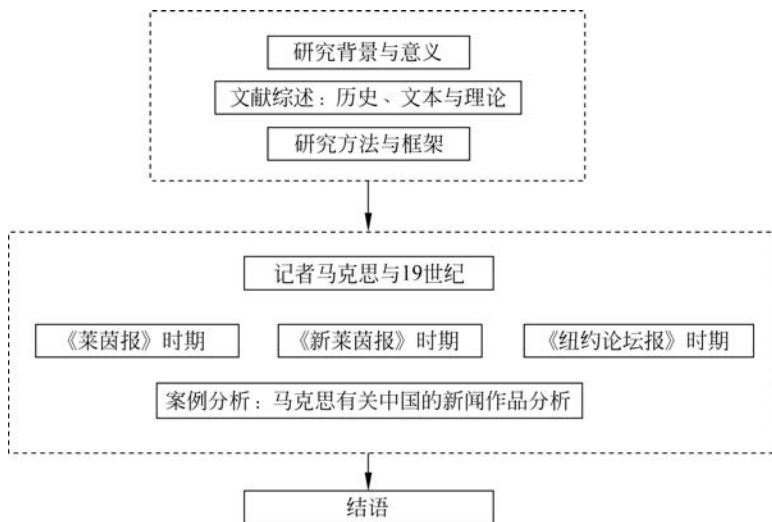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思路导图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记者的马克思”，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熟悉又模糊的研究主题。

第 1 章绪论简要勾勒“记者马克思”的生平经历，而后叙述本研究的基本背景：来自社会各界对于“马克思归来”的呼唤与当下不平衡的发展格局息息相关，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与当下语境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要求研究者付出更多努力，而对“记者马克思”的研究则更需要史料考证、意义建构与理论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因此，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主要在历史、文本与理论等层面展开相关文献回顾，梳理、分析有关马克思新闻生涯研究、马克思新闻文本的研究，以及与马克思新闻实践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关理论，如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等。本章也明确了研究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文本分析与调研访谈，而后陈述了研究思路与研究创新。

第 2 章是对“记者马克思与 19 世纪”的概论。首先以关键词的方式概述 19 世纪的全球史与新闻史概况，重点回顾“记者马克思”所置身的物质与思想环境，而后描述马克思新闻作品的时空特征。这一章是后文展开具体

分析的宏观时代背景和论述基础。

随后三个章节以时间序列的方式讲述马克思三个主要阶段的新闻经历、与之缠绕的重要议题及与之互动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环境。第3章围绕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新闻工作经历展开论述,主要总结了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基本状况、新闻文本的情况,着重论述了马克思在新闻工作中首次接触“物质利益”——“贫困问题”对他思想议程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马克思是一位“社会记者”,其新闻报道与评论具有地方性特征。第4章主要讲述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主编的经历,将马克思与《新莱茵报》置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梳理和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文本的主要内容、《新莱茵报》的议程转向,并将《新莱茵报》与同期同境其他报刊作比较,明确了《新莱茵报》在欧洲革命期间的重要意义。第5章则围绕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等报刊撰稿的经历展开分析,首先对其新闻书写的基本语境进行综述,并就马克思与“美国中心主义”的交锋进行阐释,其中包括马克思对“新闻客观性”的看法以及与亨利·凯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展的辩论。通过文本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上述三章也将归纳出特定时期内马克思新闻书写的“关键框架”。

第6章则是案例分析——以“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新闻作品分析”为题,基于重点文本与理论,探析马克思“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闻书写逻辑。

第7章是对于马克思新闻写作的特征、新闻工作与案头研究、工作习惯等情况的梳理以及对全书的总结和讨论。

1.4.4 研究创新

第一,本研究致力于在历史史料的收集、考证与分析层面实现突破。基于一手资料如马克思的书信与手稿等的查找和爬梳、对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编辑者和研究人员的访谈、对马克思“足迹”的探访等,本书有望在史实的确认和抓取、积累与认知方面取得进展,从而拓宽我们对于“记者马克思”这一形象及其与19世纪和当下互动关系的认知。第二,本研究以历史语境主义的路径考察“记者马克思”的角色及其新闻作品。一方面,对文本的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概貌,包括马克思(及恩格斯)一生新闻书写的数量分布、新闻写作的基本特征及涉及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本研究将马克思的新闻文本与19世纪的历史语境——政治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事件之间的互动作为分析的

重点。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留下的新闻文本。第三,本书也期待在理论分析层面有所推进,分析“记者马克思”在三个时段的角色、写下的文本,以及蕴含其中的理论思考。例如围绕文本和历史语境分析其在《莱茵报》时期“新闻自由”思想的生成逻辑;分析其在1848年革命期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的新闻书写及其重要话题——阶级问题,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问题;分析马克思作为《纽约论坛报》驻外记者期间的新闻文本和新闻活动,其中特别以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为例探讨马克思对于中国、对于东方的态度,回应相关的理论论争。

本研究期待通过对马克思的新闻实践、新闻文本的考证与探析,抽离出几个重要的议题和关键的“思想框架”,从而对“记者马克思”的新闻、文本和思想演进逻辑做出解释,由此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关于新闻记者的角色、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第2章 记者马克思与19世纪

2.1 革命、资本、帝国：19世纪的关键词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的物质和思想环境中。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著“世纪四部曲”清晰地勾勒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主要特征。他为19世纪概括了几个关键词：革命、资本、帝国。在其笔下，相较于“短促”的20世纪，19世纪无疑是漫长的，这一“漫长性”体现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绵延性：19世纪可以被认为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914年“一战”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这段时间的关键词是“革命”；1848—1875年则属于“资本”的年代；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是这段时期的关键词。在《革命的年代》一书导言中，霍布斯鲍姆提到“词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例如“新闻出版”“意识形态”“无产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阶级”等词汇都是1789—1848这60年中新造的或是应运而生的词汇。

在经济增长、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大背景下，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这一个世纪游荡、盘旋，是意识形态领域一支重要的革命性的思想流派，直接影响到了普罗大众、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全球交往。然而，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与作品又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用斯特德曼·霍内斯(Stedman Jones, 2016)的话说，“从一开始，他就要在世界留下印记”。马克思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欧洲刚刚从法国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犹太解放尚不彻底、莱茵地区政局动荡——在拿破仑政府统治下接受了法国的诸多影响，普鲁士的专制统治使社会氛围变得压抑。这一系列外部事件对马克思的家庭和命运产生着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涉及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职业选择。斯特德曼·霍内斯(Stedman Jones, 2016)将马克思理论与思想的发展线索与法国大革命对“普遍权利”的倡导，以及众多政治事件中开始暴露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牵连与分裂等因素联系起来，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何以是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背景。

本书的讨论重心在于“作为记者的马克思”这一部分——如果再次使用霍布斯鲍姆的框架,我们可以说记者马克思亲身经历、实践、钻研和发展了“革命”“资本”“帝国”这三个核心命题,在较多时间里,马克思是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记录、反思他所置身其中的19世纪的种种现象及现象背后的道理、逻辑和理论,直接与他所置身的“世界”开展对话、论辩,并提出政治行动的设想和方案。正因如此,对马克思新闻作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这三个命题。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19世纪以“维也纳”欧洲均势体系开始,又终结于以19世纪末众多事件(如“马关条约”“三国还辽”“八国联军一日俄战争等序列事件)为标尺的“新型帝国主义”体系(汪晖,2020)。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开启了欧洲均势体系,这一“维也纳体系”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第二个国际体系,大国均势与协调的机制暂时保证了欧洲“总体和平”。该体系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转型,欧洲大国的扩张势头逐渐冲破“均势体系”的框架,同时向外的扩张力量也受到了来自世界边缘地带的顽强反抗。1860—1914年是帝国全面发展时期(安德鲁·波特,2014)⁹⁸,在这一时段欧洲内部发生了如下重大事件:1848年欧洲革命,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66—1870年普法战争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法国遭到失败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等等。这一历程中,民族主义已经逐渐释放出其强大的势能(安德鲁·波特,2014)⁹⁸。在“漫长19世纪”的结尾和“20世纪”的开端——“一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的国联(League of Nations)体系开始承接大国协调体系,新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经济生产效率在19世纪实现巨大提升:西方国家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财富的积累,对外贸易额大幅增加,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逐渐加剧。与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相伴的,是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以及不均衡的经济资源与财富分配。1857—185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由普遍的生产过剩和投资投机行为引发。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并传导至英国。而1870年后,经济萧条和不稳定持续了25年,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局势。大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大国对外扩张政策相互紧密配合,如艾尔维特在考察了1860—1884年的历史后,认为“帝国扩张服务于阶级统治,使得政治经济免于遭受大萧条带来的冲击的影响”(Elwitt,1975)。

德国著名全球史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中并未使用为人熟知的术语,例如工业化、

城市化、全球化等来提炼漫长的19世纪,而是从五个较为生僻的角度概括了19世纪的特征。第一,19世纪是一个生产率大大提升的年代。第二,在19世纪,流动性增大,比如旅行、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语言、贸易、战争等。第三,不平衡的相互关系增强(asymmetrische referenzverdichtung)。相互关系的增强拓宽了彼此的视野,从而形成了“示范效应”和“参照社会”。但是全世界的参考点逐渐变得单调——“‘西方’作为全世界标杆式文化参照系取代了若干样板式文化中心”。第四,平等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对立。“通过消除各种歧视、解放受歧视群体而逐步实现权利平等”被约尔格·菲施(Jörg Fisch)称为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的核心进程之一。^①等级制度既体现在人种、血统等社会人口学概念上,又体现在国际秩序和国家体系层面,例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划的大国主权体系一直延续到1914年或1915年。而“文明”和“野蛮”这样二分的文明序列也正是等级制度的体现。第五,19世纪是一个解放的世纪。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或是延续到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展现了一段“挣脱束缚”的历程。奥斯特哈默在最后一章说道:“资本主义的再生能力似乎力有不逮,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自由主义在其所有四个面向——道德—个人伦理、内政—宪法、国际和经济——都承受着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强大压力,在世界范围丧失了影响力。”^②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诸多著述、观点凝聚成为一股生命力旺盛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中期之后逐渐展开它的影响。

2.2 报纸、记者、政论：19世纪的新闻传播

赫雷斯(Herres,2006)称19世纪是属于新闻传播的百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唤起了民众对于阅读、掌握时事信息的期望。而从技术、媒介的角度看,“19世纪的技术特征使得很多片段达到了‘媒介式永恒’的程度。报刊、照片、图书馆、档案馆、电影、摄影、博物馆等,都是19世纪的发明”。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文明交流及信息交换的需要,促成了主要由纸媒、电报等搭建起来的“公共领域”,以分享和

^① Jörg Fisch, *Europa zwischen Wachstum und Gleichheit. 1850—1914* (=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Europas. Bd. 8 = UTB 2290*) (Stuttgart: Ulmer, 2002), s. 29.

^② Reinhard Bendix, *Könige oder Volk: Machtausübung und Herrschaftsmandat.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0), s. 17,转引自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286页。

传播信息。19世纪中叶,通信技术的颠覆式发展促进了跨国通信往来。“1844年,长途电报正式投入应用。1851年,世界上第一条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报电缆铺设完成。1866年,横跨北大西洋的电讯线路正式建成。1862年,全球陆基电报网络的线路长度已达到15万英里。1876年,印度与大不列颠帝国各殖民地以及首都伦敦之间,都已通过电报电缆联系在一起。”(Osterhammel,2015)

19世纪报刊出版发行的地理范畴也逐渐从欧洲扩展至全球。1828年全球大约印刷了3200份报刊,一半都在英语国家,英国报刊在当时是行业的领头羊,欧洲大陆国家的报纸大多受到严格的管控;在1900年之前,全球大约出版了31000份报刊,其中仅有600多份在印度,195份在非洲,150份在日本(Herres,2006)。

那时的信息传播速度虽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在19世纪,消息报道速度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跃升。赫雷斯(Herres,2006)指出,1805年英国某地发生战役,直到这件事被英国报纸报道,花了17天;而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伦敦的《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只用36小时就发出了一则战役报道。新闻传播的“速度”和“时效”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表达的范式。在马克思刚刚为《纽约论坛报》写评论文章的时候,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还未搭建起来,一则来自纽约的消息,通过邮寄方式到达伦敦可能需要数天时间。在一篇新闻评论发表出来的时候,新闻往往已经成为了“旧闻”。也正因如此,这种现在看来迟滞性的新闻报道,似乎对“深度分析”和“理论反思”的要求更高,作者们关注的话题与历史演进等大问题的关联也更密切。MEGA 2第16卷的前言记录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在马克思报道印度起义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了五个星期,而马克思文稿寄送到纽约并最终被印发至少需要12天的时间。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一文则成功预言了英格兰银行法的废除。这篇文章1857年11月21日在《纽约论坛报》发表,事实上马克思在11月6日就已经完成写作,法案在11月12日被废除,而《纽约时报》却还在发文支持这个法案,认为它不会被废除。^①

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变化的、高度浓缩的百年。在19世纪,报业范式主要经历了由政论报刊、政党报刊到商业报刊再到大众报刊的转变。新闻报道中“客观性”原则的提出,在“观点纸”转向“新闻纸”这一过程中扮

^① Marx an Engels, 8 Dezember 1857. In : MEGA^②, III/8. s. 209.

演了重要角色。李彬(2005)在《全球新闻传播史》一书中探讨了19世纪商业报兴起、美联社的“客观性”原则的内在逻辑,以及商业报刊在资本主义文明、民族国家建设、自由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取代政党报刊应运而生的历史过程。这部书剖析了由美联社提出的“新闻客观性”这一理念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美妙而虚幻的“神话”;二是维护现状、拒绝异端的“盾牌”。

“观点纸”到“新闻纸”的演进过程最为显著地发生于美国。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从政论报刊《莱茵报》、政党报刊《新莱茵报》到兼具政党属性和大众商业属性的《纽约论坛报》,在他历经的这一变革背后,世界中心正缓缓地从欧洲迁向美国。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范式转变,我们有必要再次理清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客观性、新闻自由主义等几个概念在美国新闻业史脉络上生成和演化的关系。马克思与这一新兴的由美国主导的新闻范式以及与之配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正面交锋。

在19世纪,新闻报刊是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要载体,无论是在民族共同体意义上,或是在阶级意识层面上。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出版活动,例如出版报纸、杂志等,意味着“民族发展的关键一步”(霍布斯鲍姆,2017a)。报刊也是共享某种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变革愿景的共同体“机关”,大量半官方、民间的、社会团体的报刊开始出现,负责输出某种社会集团或是政治派别的观点主张。新闻记者则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纽带,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在各自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尤其在19世纪中叶“政论报刊”——观点纸范式盛行,大部分报刊文章为“政论文”,围绕某一事件或哲学思潮进行深度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笔者与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的访谈,在19世纪末价格真正降下来之前,报刊一直是一种昂贵的存在,欧洲普通工人没有足够的薪水订阅报纸,这也一定程度促成了公共读报活动——在19世纪,工人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常在小酒馆、餐馆聚合,听工人协会领袖读报,这构成了19世纪一幅有趣的景象——听报小组聚在一起就政治话题进行讨论,与具有中产阶级气质的“咖啡馆—公共领域”形成参照。

记者马克思的祖国——德国,是“新闻学”这一概念的发源地。17世纪末,德国大学开始有学生以报业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的《德国新闻事业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19世纪德国报业发展迅速,主流的新闻报道范式从写作新闻学(schriftstellerischer Journalismus)转向编辑新闻学(redaktioneller Journalismus)。除了从事批判性、研究性的文章写作的作家之外,还有进行日常新闻报道的新闻记者,在19世纪的德国,这两种类型的记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Herres,2006)。

2.3 记者马克思及其新闻书写的时空特征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进行统计是一个连续的、不断逼近准确值的过程,需要多方开展全面的历史考证工作。根据理查德·施佩尔(Richard Sperl, 2002/2004)的研究,马恩在 12 个国家的 130 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将近 2000 篇文章,赫雷斯(Herres, 2006)也引用了这一说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与研究写作是如此密不可分,因此两人合作或独作的文章均被纳入本研究的统计范围中。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原报刊的署名进行分析可能出现偏误,因为一些署名为马克思的文章实际上是由恩格斯执笔的,例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第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在报刊上标注为作者“卡尔·马克思”,然而事实上是由恩格斯撰写的。^①

本研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 2),以及郑保卫、童兵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进行综合考证和统计,重点关注报刊类出版物,马恩至少在以下 20 种报刊发表了文章:德国科隆《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德文)、法国巴黎《前进报!》(*Vorwärts!*, 德文)、英国利兹/伦敦的《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英文)、法国巴黎《改革报》(*La Réforme*, 法文)^②、比利时布鲁塞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 德文)、德国科隆《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德文)、美国纽约《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英文)、英国伦敦《人民报》(*People's Paper*, 英文)^③、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 3-115 页。

^② 《改革报》(*La Réforme*)是一份持左翼激进民主共和党派政治立场的报刊,1843—1850 年在巴黎出版,出版过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作品。1847 年 10 月至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数篇文章,蒲鲁东、巴枯宁等也曾为该报撰稿。

^③ 《人民报》1852 年 5 月 8 日在伦敦创办,是宪章派的周报,创办者是宪章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Ernest Jones),有研究分析他在马克思“多线性史观”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考 Thierry Drapeau 2019 年的文章“‘Look at our Colonial Struggles’: Ernest Jones and the Anti-Colonialist Challenge to Marx's Conception of History”)。该报也转载过《纽约论坛报》上马恩的文章。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数篇文章并支持报刊的编辑工作。

英国伦敦《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英文)^①、美国纽约《改革报》(*Die Reform*, 德文)、德国布勒斯劳^②《新奥得报》(*Neue Oder Zeitung*, 德文)、英国伦敦《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 英文)、英国伦敦《人民报》(*Das Volk*, 德文)^③、英国伦敦《观察家》(*The Examiner*, 英文)^④、英国伦敦《旁观者》(*The Spectator*, 英文)^⑤、美国纽约《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德文)、南非开普敦《南非》(*De Zuid-Afrikaan*, 荷兰语)^⑥、奥地利维也纳《新闻报》(*Die Presse*, 德语)^⑦、英国伦敦《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 英文)、英国伦敦《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英文)^⑧。马克思主编或供稿的报刊所辐射的读者群体远远超过了其生活和活动的范畴(主要是欧洲大陆),扩展到了北美,甚至还包括非洲(南非)。鉴于马克思新闻书写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之广,他的新闻工作已经具有“世界性”特征。

图 2-1 刻画了 1842—1875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各报刊的发表数量,由图

①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这段时期该报发行量一度仅次于《泰晤士报》。狄更斯是其早期供稿人之一。

② 即现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拉夫。

③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Elard Biskamp)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开始积极支持该报的发行、编辑等工作。6月4日第5号发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内容。在6月11日的第6号上,该报宣布马克思、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是报刊重要的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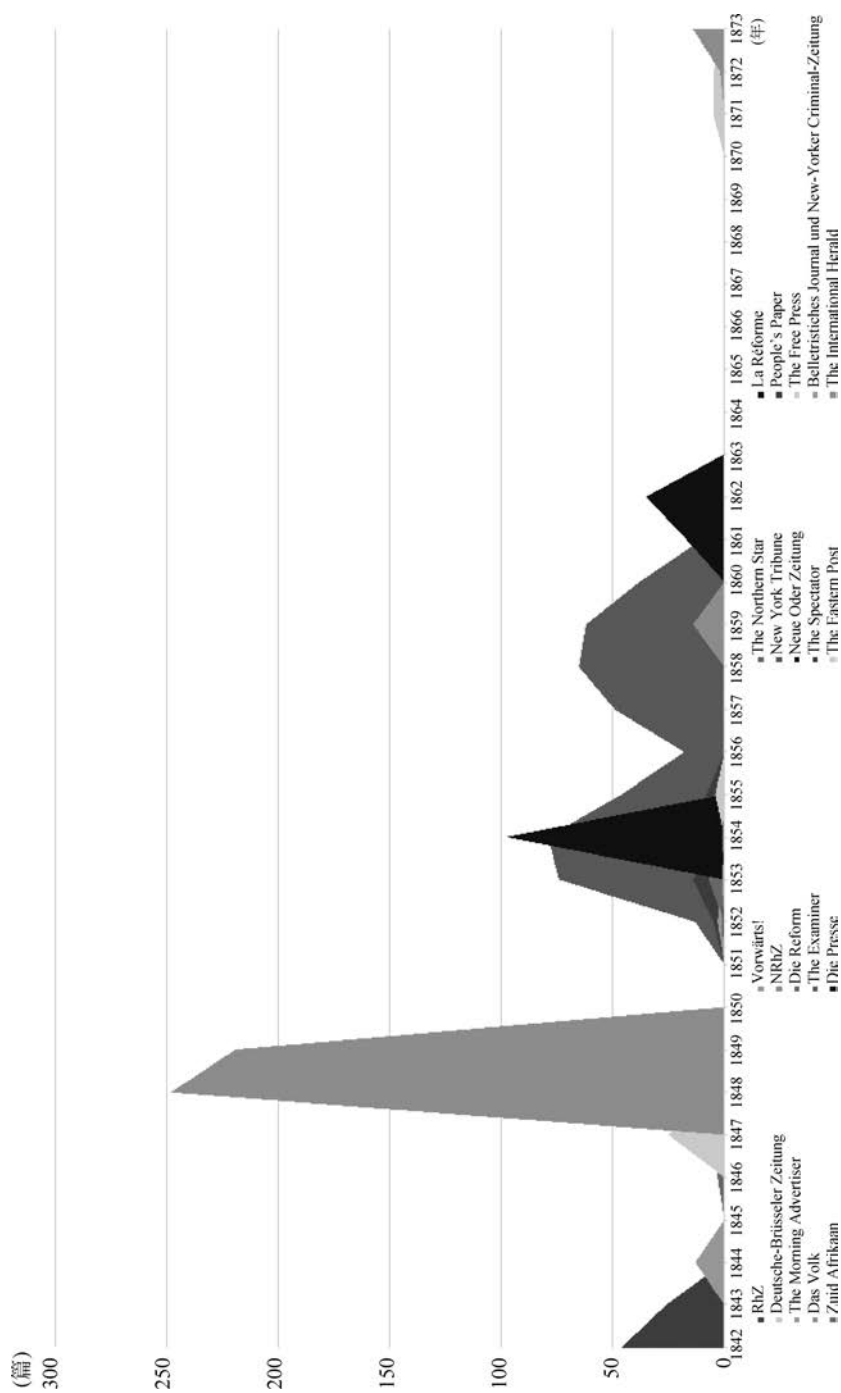
④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报,1808—1881年于伦敦出版。

⑤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

⑥ 《南非》(*De Zuid-Afrikaan*)是一份荷兰语报纸,1830—1930在南非开普敦出版,这份报刊的出版商是 Carl Juta,他是马克思的妹夫(整理自维基百科)。

⑦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的一份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48年7月3日在维也纳创办。19世纪60年代初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一些文章,例如有关美国南北内战的评论。德国政论家麦·弗里德兰德(Max Friedländer)1856年参加到《新闻报》的编辑工作中,他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855年为该报撰稿。19世纪60年代初它在所有用德文出版的报纸中订户最多(3万订户),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有关(参考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5/056.htm>)。

⑧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是英国伦敦的一家周报,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出版。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表了相关的会议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如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一文。



可见马恩一生的报刊文章发表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基本可以划分为《莱茵报》时期(1842—1843)、《新莱茵报》时期(1848—1849)和《纽约论坛报》时期(1851—1862)这三个主要阶段。发表数量最为丰富的阶段当属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在报刊文章发表量最高年份——1848年——发表了超过250篇文章,其次是在1849年,发表了超过210篇文章。第二个发表高峰则出现在1854年,超过180篇文章,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为《纽约论坛报》和《新奥德报》撰稿。马克思、恩格斯发表文章载体丰富度(报刊种类数)最高的时期在《纽约论坛报》时期,除为《纽约论坛报》撰稿外,也为其他至少11种报刊撰稿。值得注意的是,在1856—1857年马恩发表文章数量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这与美国经济危机有关,当时《纽约论坛报》受到了经济重创。在这几种主要的报纸上,马恩发表文章总数超过1200篇(连载文章亦考虑在内)。

除了报纸之外,马恩还在不少杂志上发表文章,例如《德法年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工厂”杂志》等,此外也为《新美国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撰写词条文章。

2.4 本章小结

19世纪作为一个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在19世纪找到诸多政治经济命题的线索,例如民主、自由、共和、社会主义、贫困、工会,等等。在政治轴向上,19世纪的绵延历史中活跃着许多重要的议程,来自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等思潮的主张和诉求,逐渐将陈旧的封建贵族制度推向边缘,并且在互相的辩论和竞争中催生出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雏形和相关理论。而这些思潮发展和相互交锋的背景是人类快速提升的生产力水平、大量的物质财富积累、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扩展了的世界市场和跨民族交往。与激进的政治议程相伴相生的则是越来越活跃的、难以被压抑的新闻活动——主要是以报刊为载体的信息传递和政治性辩论。新闻记者们在19世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当地和远方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论者,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议程的推动者和政治话题的论辩者——这与19世纪盛行的“政党报刊”范式有关,同时也与当时记者这一职业的知识分子属性有关,大多数记者都是当时学问广博、视野开阔的知识分子,他们乐于参与到政治行动中来,无论是在官僚系统参政议政,还是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进行议题讨论。马克思

作为 19 世纪众多知识分子型记者中的一员,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都与新闻工作有关——从担任《莱茵报》撰稿人和主编开始,他在超过 20 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读者群不仅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也经由《纽约论坛报》扩展到了北美大陆,他还曾为一份荷兰语报刊《南非》撰稿。19 世纪的客观环境和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可供讨论的话题。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无产者的赤贫现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奴隶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等,这些都为马克思进行新闻书写提供了素材,并推动他致力于发展出克服这些问题的理论路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3章 激进主义撰稿人： 《莱茵报》时期

谁跟随在他(布鲁诺·鲍威尔)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他有一颗暴烈的心。
他不是走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紧攥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像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猛冲,
好似恶魔缠了身!

恩格斯和埃德加尔·鲍威尔(Edgar Bauer)一同写作的这篇英雄戏剧所描述的主人翁——这位风驰电掣、无所畏惧的特里尔之子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 1818 年出生于特里尔。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是一位犹太裔律师,生活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政局动荡的莱茵省,这样的时空环境下,亨利希·马克思不免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潮的影响。根据他的孙女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的回忆,亨利希·马克思“是个地道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和卢梭熟稔于心”^①,在政治倾向上,基本与莱茵省的自由派一致。作为加入基督教福音派的犹太人,这一身份使得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政治角色显得相对复杂(Stedman Jones, 2016)。与政治观点相对谨慎的父亲相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更为激烈,这一点也体现在马克思的职业选择上。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优秀的律师,过上优渥的生活,但是马克思向往着更宏大的事业。马克思的母亲亨利达(Henriette, née Pressburg)出生于荷兰,在众多版本的传记中被描述为一位“只关心家庭事务”的妇女——亨利达在马克思读书时期非常关心他的身

^① McLellan (ed.), *Karl Marx: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p. 163, 转引自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体状况,写信叮嘱他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健康。^① 马克思在家乡的特里尔中学接受了基础教育。1830年,在他就读中学的第一年,恰好是法国爆发七月革命的那一年。1835年,马克思作为年龄最小的学生,以全面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写下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已经展现出宏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尽管文章还带有比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其勇敢的担当和阔大的视野已超越了同龄人。马克思的一生也恰恰呼应了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在文中,马克思指出应当为他人、为全人类的福祉工作。他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他鼓励青年人跳出狭隘的自我空间,选择为人类劳动的职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②。特里尔中学校长约翰·胡戈·维滕巴赫(Johann Hugo Wyttenbach)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文章非常好,思想丰富,表述有条理性”,但是也指出不足:总是试图使用精美如画的语言——导致一些章节不够清楚和准确。^③

马克思从小便展现出过人天赋,他的父亲对他自然寄予厚望。在他的弟弟海尔曼·马克思被父亲安排到布鲁塞尔学习经商的同一天,马克思则来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律。父亲希望他可以“子承父业”,成为优秀的法律工作者。马克思乘着一叶小船,过道科布伦茨,而后又改乘汽船,在1835年10月17日到达了波恩,与如今千千万万的大学生相似,在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乡,进入学问殿堂。

然而马克思的大学学业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学期,马克思修读了六门课,包括法学全书、法学阶梯、罗马法史、希腊罗马神话、荷马问题、近代

^① “Heinrich and Henriette Marx to Karl Marx”, early 1836, MECW, vol. 1, p. 651-652, 转引自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卡·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55-460页。

^③ Johann Hugo Wyttenbach to Karl Marx, August 1835, MECW, vol. 1, p. 733, 转引自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艺术史,根据《波恩大学肄业证书》的记载,表现均为“勤勉和用心”,其中四门课程评语中还有副词“极为”或是“十分”^①。但是由于学习过度勤奋,不久马克思病倒了,在第二学期,学习的动力减弱,而且马克思当上了特里尔同乡会的主席,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社交活动上,成绩有所下滑。在其父亲的安排下,马克思转学至柏林大学。在波恩大学一年课程结束后,马克思拿到肄业证书,暑假在家休整了一个月,就带上行囊,花了五天时间辗转到达柏林。

柏林大学在德国乃至欧洲享有极高的声誉,学术气氛浓厚。在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黑格尔在当时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而马克思也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其交往的朋友大多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一同读书、讨论、写作、出版。这为马克思此后的记者生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知识技能的基础和氛围。然而柏林没有成为马克思的长期驻留之地,博士毕业后,马克思未能如愿获得教职,后来他回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莱茵省,来到距离波恩不远的科隆,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为《莱茵报》撰稿。

3.1 历史语境：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

3.1.1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朋友圈”

黑格尔哲学将德国乃至欧洲哲学发展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了一支激进派——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或称黑格尔左派,与坚持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老年黑格尔派相对,青年黑格尔派注重对宗教的批判、强调自我意识,尤其在30年代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成员包括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莫塞斯·赫斯(Moses Hess)、费尔巴哈(Feuerbach)等。这其中重要的团体是由布鲁诺·鲍威尔领导的“博士俱乐部”,又称“自由人”(Die Freien),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马克思也积极参与“博士俱乐部”的讨论活动,在思想上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图3-1为笔者绘制的青年马克思在1841—1843年的“朋友圈”。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柏林大学教授、黑格尔思想的追随者爱德华·甘斯

^① 参见：波恩大学肄业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935-938页。

(Edward Gans)曾为马克思授课。马克思在大学时期主要与布鲁诺·鲍威尔领导的“博士俱乐部”交往甚多,而后开始逐渐加入社会主义者群体进行报刊编辑与写作工作,这其中包括《莱茵报》以及由阿尔诺德·卢格和莫塞斯·赫斯领衔的《德法年鉴》[此前有其他名称,如1838—1841年为《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1841—1843年为《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赫斯较早开始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互有影响,在后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便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而卢格则很早就开始批判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对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同时,借由《莱茵报》和青年黑格尔派这一思想派别,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进行知识、理论、政治认知、新闻传播等层面的交往。他们都是《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年11月的后半月,恩格斯在前往英国的中途拜访《莱茵报》编辑部,与马克思初次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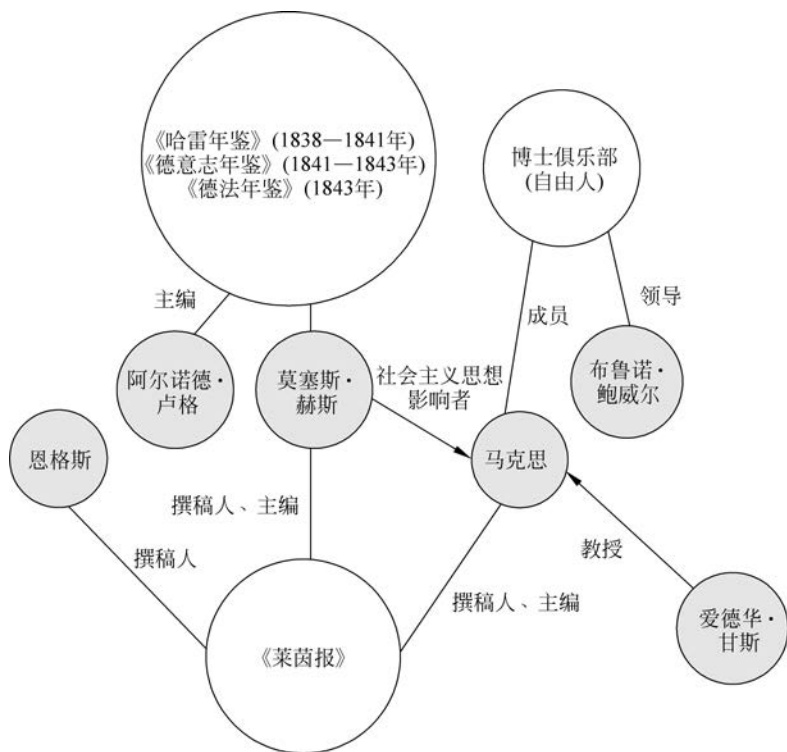


图 3-1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1—1843年)

3.1.2 德国莱茵地区与记者作为“普遍”职业

在“整体压抑”的普鲁士统治的环境下，位于德国西南部的莱茵省与比利时、法国接壤，“十字路口”的位置优势使得它在19世纪一直是特立独行、社会气氛相对活泼的地理性存在。如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所言：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

这里也活跃着各行各业的激进人物，“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①。而其中，作为莱茵地区的最大城市，科隆自然成为思想激进者的聚集地（事实上莱茵地区时至今日仍是德国经济、思想最为活跃的区域）。不少文化、政治活动家选择科隆作为活动地点，马克思也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博士毕业后两段集中的新闻实践经历都发生在这里。马克思第一份职业是《莱茵报》的新闻记者和编辑，然而他这样的境遇并不特殊。新闻记者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家、政治活动家共享的职业种类，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曾是一位记者和印刷工；又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家、医生，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的主人公让-保尔·马拉，是一名甚有成就和影响力的记者，曾创办《人民之友报》（*L'Ami du Peuple*），该报是当时巴黎最著名的报纸。恩格斯也对马拉称赞有加：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人民之友报》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

^①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被扭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出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革命叛徒的面目,还在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地革命。^①

再如著名的文学家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也是一位重要报人,马克思后来在伦敦期间还曾为其创办的《每日新闻》撰稿。同时,新闻记者往往是当时知识分子从大学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运气拿到教职进入大学工作。例如黑格尔在获得稳定的学术职务之前,曾做过班贝格(Bamberg)当地报纸的编辑(Oltermann, 2020)。马克思也没有能进入“高校”从教,而是选择了从事独立研究,与此同时兼任新闻记者、编辑和作家。

3.1.3 《莱茵报》的创立与发行

1842年元旦,《莱茵报》在德国莱茵省科隆市创刊,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当时股东希望将报纸办成论述经济问题的、立场温和的报纸,主要论战对象是支持天主教的《科隆日报》(Stedman Jones, 2016),后来实际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阵地。这份报纸主要有三类读者:第一类是青年黑格尔派,更广泛而言是中欧地区的激进学者;第二类是普鲁士当局;第三类是科隆的居民,活跃其中的有新进的共产主义者,以及激进共和派或是温和的民主派,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还有商人、银行家、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成员(Sperber, 2013)。

马克思1842年4月开始为《莱茵报》撰写文章,后来时年24岁的他成为该报的主编,任职有五个月之久。普鲁士书报检查官圣·保尔在递交至上司的报告中,称马克思是《莱茵报》“整个事业单位的精神首脑”,“马克思博士在这里是理论的核心,是这家报纸活生生的理论源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81)。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马克思对文章的要求很高,他要求文章实事求是,反映现实,表达明确,拒绝“假大空”。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提到“三少三多”的原则:“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0页。

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①

3.2 关键框架：国家与市民社会

3.2.1 核心关切：贫困问题——黑格尔的“苦恼”与马克思的“难事”

摆脱“贫困”至今都是全球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务。2015年，在联合国成员国投票通过的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7)中，“消除贫困”(No Poverty)位列首位。对于“现代社会之贫困”的探讨基本起源于18、19世纪，以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地区开启了日益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工人的过度劳作、城市环境污染，等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大幅增加。这引发了众多学者、记者、政治活动家等的关注。黑格尔(1961)²⁴⁵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代言人，他发掘了现代贫困与古代贫困的不同，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达成了“自由的阶段性实现”，这一方面有着解放和自由的属性，却又带来奢侈与贫困。市民社会有责任却最终无力真正消除贫困。在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市民社会将个人从家庭的范畴中拖拽出来，促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这些个体遭受经济意义上不幸的可能性。^② 市民社会中的穷人被排斥在社会安排之外，成为“贱民”(Pöbel)。^③

黑格尔这一论述非常重要，成为马克思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它为马克思后来的新闻工作和理论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① 卡·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36页。德文原文：Ich forderte auf, weniger vages Raisonement, großklingende Phrasen, selbstgefällige Bespiegelungen und mehr Bestimmtheit, mehr Eingehn in die konkreten Zustände, mehr Sachkenntniß an den Tag zu fördern. Marx an Ruge, 30. November 1842. 参见 MEGA②, III/1, s. 38. (I demanded of them less vague reasoning, magniloquent phrases and self-satisfied self-adoration, and more definitenes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more expert knowledge. https://marxists.catbull.com/archive/marx/works/1842/letters/42_11_30.htm)

^② 受到王金林教授2021年3月3日上午在清华“西方马克思主义”课堂上讲授内容的启发。

^③ Erica Sherover, “The virtue of poverty: Marx’s transforma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the poor,”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 no. 1(1979): 53-66.

主题,即“现代社会的烦恼——贫困问题”以及基本的思考框架或是一组紧张关系,即“国家与市民社会”,并且明确了与之相对的思想传统,即洛克和斯密式的启蒙自由主义理论(夏少光,2018)。马克思在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的记者,到后来担任主编,大量的工作涉及对当地(莱茵地区)政治、社会问题和政策的评论,其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即“贫困问题”。例如1841年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开展辩论,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居然要剥夺贫民“捡枯树枝”的朴素权利,将这一行为判为犯罪。马克思义愤填膺地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大力批判了议会代表的观点。而后《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再次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张力,并且提出两者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报刊自由之重要意义:报刊自由作为一种中介,可以使得来自贫困人民的声音被感知,从而促进一种普遍利益。

马克思在后来常常回忆起《莱茵报》时期遇到的“难事”,即为“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而这个难事,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现代社会之“苦恼”——贫困问题。尽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依旧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这一“物质利益”相关的问题,直接将马克思导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动他逐步发展出唯物史观。“无产阶级”这一关键概念的出场与马克思对于身处贫困境况中的莱茵省农民们的深刻同情有着逻辑上的必要联系。与黑格尔将“贱民”归为沮丧的、无奈的、消极的、被排斥的人群不同,马克思将无产阶级放置在了充满力量的、积极的、关键的革命的位置上——他们是历史的有机组成,他们可以书写历史。

3.2.2 文本分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从1842年初到1843年3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作为记者和编辑的马克思为该报贡献了30篇^①文章(见表3-1)。早期文章包括《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登记会议记录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和《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等。先于《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版第1卷。^② 这些文章大多以“莱茵省一居民”署名,多数文章涉及对当时社会重要议题、流行思潮的讨论,例如对于报刊自由、报刊角色等问题的辨析,以及对当地法律、政策的评论。在斯特德

^①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统计。

^② 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107-135页。

曼·霍内斯(Stedman Jones, 2016)看来,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更像是一种“应用哲学”的实践表现。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接受到的经典教育对其行文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黑格尔式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思考方式。他的写作是愤怒的、讽刺的、论战性质的——常常使用戏谑的类比、辛辣的笔调(Sperber, 2013)⁸³。

戴维·麦克莱伦(2016)的《马克思传》这样评价《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

表 3-1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发表日期	标 题
1842年5月5日、8日、10日、12日、15日和19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集权问题 ^①
1842年5月17日	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 《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
1842年7月10日、12日和14日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1842年8月9日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1842年10月16日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1842年10月23日	《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

^①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这篇文章马克思没有写完,或是写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I部分第1卷第1分册。<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1/013.htm>。

续表

发表日期	标 题
1842年10月25日、27日、30日和11月1日、3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11月8日	《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
1842年11月8日、12日和13日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
1842年11月15日	《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
1842年11月16日	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
1842年11月17日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
1842年11月30日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1842年12月19日	论离婚法草案
1842年12月11日、20日和31日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
1843年1月1日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
1843年1月3日	《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作出答复的通告
1843年1月3日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
1843年1月4日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
1843年1月6日	好报刊和坏报刊
1843年1月8日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1843年1月10日	答“邻”报的告密
1843年1月12日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
1843年1月13日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1843年1月15日、17日、18日、19日和20日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1843年1月16日	莱茵—摩泽尔日报
1843年3月9日	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
1843年3月12日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1843年3月14日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1843年3月18日	声明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标志着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物质利益问题”，并对私人利益与理性的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为了反驳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对报纸的攻击和指责而写作的一篇论战性文章。马克思首先声援这位摩泽尔记者，生动地辩护道：只

要是听到过“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可能就再也“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了。通过调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一个问题：贫困人民的呼声无法被听到。一方面，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由于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诉说自己的困境，而有能力进行表达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又“不那么显著地贫困”，因此这些言说就“没有什么根据”了。^①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经济贫困导致了社会中观点传播的不平衡现象。为了解决这一苦难，马克思提出方案：应当引入第三个因素，即自由报刊，使得这种贫困被广泛感知，被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从而减轻贫困。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对于贫农命运的关切，为马克思之后对无产阶级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笔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研究专家格拉尔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的交谈中，他强调这一时期记者马克思是一个社会问题的观察家和批判者：十分关注农民贫困问题、民主权利等话题。

3.3 哲学转向：为《莱茵报》工作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历程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刚博士毕业不久，是一位承继黑格尔思辨哲学之思想框架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德国，他目睹了劳动人民的百般不自由，甚至连拾起枯树枝的权利都被剥夺。1842年年初，普鲁士政府在政治领域的镇压政策使得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被逐出大学讲坛，马克思被迫放弃了成为大学教授的职业规划。在这样的政治情形下，马克思将目光投向新闻出版事业——观点交锋和舆论斗争的阵地。在接触到“物质利益”问题之前，马克思与当时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哲学时尚”——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辩证法思想等的影响。不少研究就马克思这段时期的新闻自由思想展开了讨论，新近的研究如徐梦菡、李彬(2020)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和时代思潮的演进过程出发，深刻剖析了此时马克思自由观的基本内核和时代属性。笔者希望进一步指出的是，除了须认识到马克思的言说环境和思想环境之外，也须理解《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报刊自由思想的生成逻辑。如上文指出，马克思将新闻自由视作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重要中介——否则那些没有时间、没有书写和表达能力的贫困人民就无法言说自己的苦难。马克思看到的、接触到的农民

^① 卡·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连载于1843年1月15日、17日、18日、19日和20日《莱茵报》第15号、17号、18号、19号和20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57-390页。

贫困问题更加使他确认报刊自由的重要性,他希望报刊能够协助搭建一个“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平台。这样的愿望也一定程度说明他仍深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框架影响。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对此进行评论和写作的需要,促使马克思从纯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1859年曾回顾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1895年4月,恩格斯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②

《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开启了辗转多国的流亡生涯。在巴黎,马克思加入卢格的《德法年鉴》从事编辑工作,同时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秘密小组”(Secret Society)密切交往。在此期间,他与海涅、费尔巴哈等人有过深入的交流(如图3-2所示)。1844年2月,马克思在他与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正式出场,马克思论述了普遍的人的解放、彻底的革命与局部的革命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并确认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角色,他生动地写道:“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表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③这篇文章也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逻辑颠倒了过来: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正是这一唯物主义观点促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入合作,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也回顾道:“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7-11页。

^② 弗·恩格斯:《致理查·费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46页。

^③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页。

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①由此可见,《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工作为马克思挣脱黑格尔国家学说及其一整套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对于“物质利益”问题,尤其是农民贫困问题的思考,将马克思推向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并开启了他对唯物主义理论的探索历程。在1844年3—8月,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写了很多本研究笔记,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舒尔茨等(Stedman Jones, 2016)。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集中精力处理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段时间的笔记成为他《1844年巴黎手稿》的重要文本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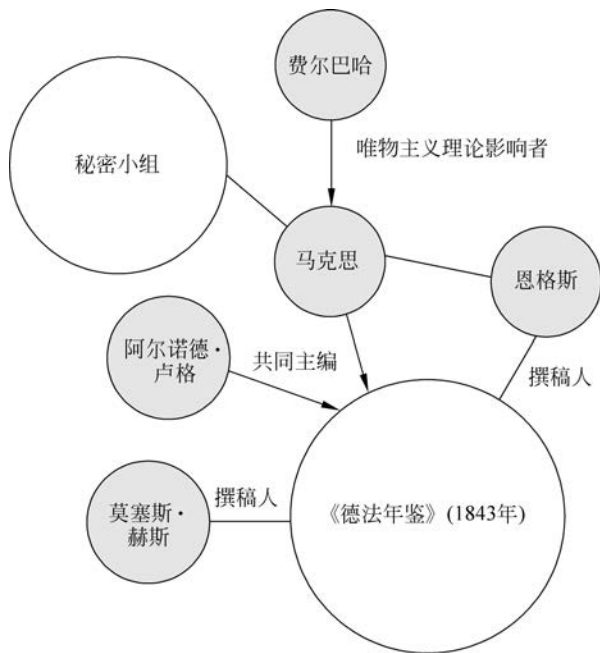


图 3-2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3—1845年,巴黎)

《莱茵报》时期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要素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逐渐从马克思的视阈中退场。例如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批判了青年黑格

^①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2页。

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1844 年中期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坐标上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发生断裂的重要节点,斯特德曼·霍内斯(Stedman Jones,2016)为此提出了三个因素:第一,“自我意识”的哲学思潮无力改变现状,例如《莱茵报》《德法年鉴》在政治高压下的羸弱表现导致纯粹的“政治批判工作”逐渐祛魅;第二,由费尔巴哈开掘出来的、异于黑格尔传统的哲学路径更适用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政治环境;第三,此时的环境是这样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凸显,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稳定而重要的阶级力量。马克思逐渐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转向社会主义,这其中有客观的理由:如果说启蒙政治和自我意识哲学在宗教批判和法律批判方面尚有锐气,那么它们在充满阶级张力的社会结构中则显得无所适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在马克思挣脱青年黑格尔派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赏了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这部书,蒲鲁东这本书也是将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关键环节^①(崔之元,2018)。当然,后来由于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严重,两人成为彼此论战的对象。

到了 1845 年,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意味着马恩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彻底批判和清算(周泉,2019),也被普遍认为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核心概念和一个核心群体,即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出场。总体来说,《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工作一方面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实践场域,将博士期间学习的哲学、历史知识,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框架应用于现实社会;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实践工作,马克思逐渐走出黑格尔的思想矩阵,实现了从客观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在此之后,马克思开始集中地、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于是长久以来对报刊自由问题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4 年在《神圣家族》中高度赞扬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一书,认为此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堪比西耶斯(Emmanuel J. Sieyès)《第三等级是甚么?》(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对于政治学的重要性’。蒲鲁东的英文传记作者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的哲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是由阅读蒲鲁东的《甚么是所有权》开始。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说,‘马克思归根结底属于蒲鲁东派’,因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说法和蒲鲁东高度一致。”转引自崔之元:《1848 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参考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2;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6);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第 225 页。

关注、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升级到了“怎么办”的层次——如何应对经济贫困，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其中一个突破即对于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视：崇尚主观自由并不是办法，解决阶级之间经济关系的不平等问题才是根本路径。由此，马克思从对“自由”概念在哲学、理念层面的支持和论证，转换到如何实现“自由”的思路轨迹上，尤其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

新闻工作之外，马克思也在欧洲不同的城市担任工人协会领袖。在流亡期间，尤其是1845年2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德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此过程中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辗转来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从事工人协会的筹办和组织工作。如图3-3所示，1847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Wilhelm Wolff）以伦敦的组织为范例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Deutsch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到年末大约有100个成员。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每周有两次集会：每周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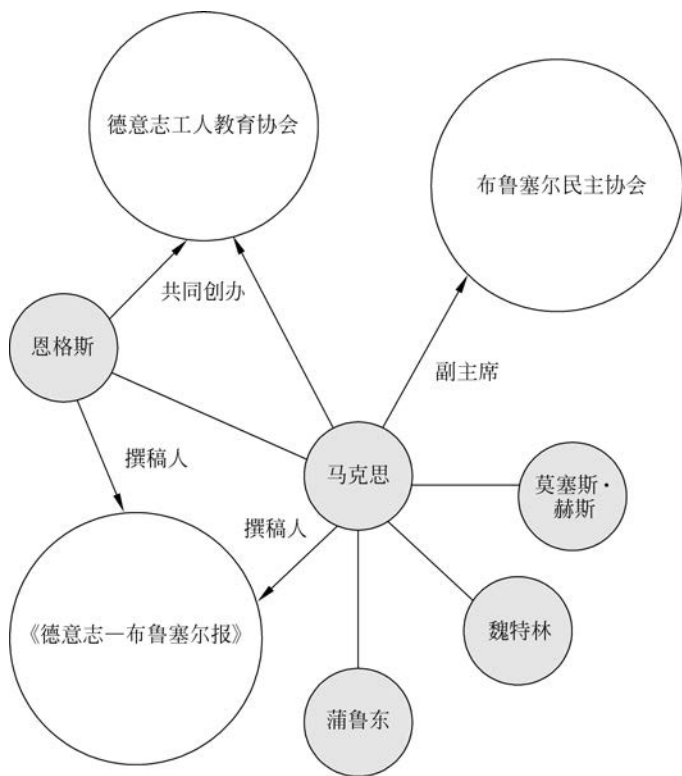


图 3-3 马克思的“朋友圈”（1845—1848年，布鲁塞尔）

办讲座,例如马克思曾做有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周日集会则由威·沃尔弗带头宣读新闻,而后是诗歌朗诵等活动(Stedman Jones, 2016)。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此时马克思与蒲鲁东展开了理论争论,与魏特林就社会主义议题进行辩论,而与赫斯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这一部分将在下一章进行阐述。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报刊活动与社会政治活动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这也是他此后人生中的三个主要线索。

3.4 本章小结

为《莱茵报》撰稿是马克思博士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作为“莱茵省一居民”,马克思围绕当地诸多社会话题、政治话题撰写评论,与当地保守主义代表展开辩论,这一阶段其新闻书写的关键框架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格外关注贫困问题和农民问题,为解决贫困这一难题,他提出的一个方案是“报刊自由”——人们能够以报刊为载体自由发表意见,从而实现国家与市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得来自“贫困人民”的声音被普遍注意和感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

《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工作经历似乎产生了两个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为马克思提供了实践黑格尔哲学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走出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在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对解决“物质利益”问题无济于事,他开始反思和批判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并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莱茵报》时期前后马克思的交往范畴也从青年黑格尔派逐渐转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学时代积极参与“博士俱乐部”,与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过从甚密,而后更多地受到了莫塞斯·赫斯等社会主义者的影响。1842—1848年,社会主义的要素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方面,马克思不仅是《莱茵报》的撰稿人,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编。他的文章底蕴深厚、旁征博引,书写风格泼辣戏谑、生动活泼。在他的编辑精神(例如“三少三多”的要求)引领下,《莱茵报》发行量得到显著提高。1842年10月,24岁的马克思成为《莱茵报》实际的主编后,报纸发行量一度从600份增长到3400份(1843年年初)(Nippel, 2018)¹⁵。作为激进主义撰稿人,马克思的文章在莱茵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公共影响力,科隆也成为马克思开展新闻活动的主战场。《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辗转欧洲多地,并于1848年回到科隆,开启了一段“革命创业”之旅。

第4章 社会主义舆论家： 《新莱茵报》时期

在正式进入这一章之前，我们需要暂停、调焦，从19世纪40年代初的科隆和《莱茵报》中抽离出来，再次概览一下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欧洲和德国的基本情况。这段时期的欧洲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全球重心，其内部也涌动着激烈的政治议程。其中，1848年革命是欧洲19世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高峰，也是“记者马克思”生涯的重要节点，此时的马克思辗转巴黎、布鲁塞尔，最后回到科隆担任《新莱茵报》主编，他已经从区域性报刊《莱茵报》（1842—1843年）的记者和主编成长为辐射欧洲范围的重要革命者、共产主义报人和新闻记者。

本章将马克思与《新莱茵报》置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语境之下，尝试分析马克思的新闻活动与历史语境及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马克思的报刊活动与同时代报刊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在革命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力，《新莱茵报》在其中有何特殊性与普遍性价值？马克思如何组织《新莱茵报》的报刊工作？《新莱茵报》的编辑与发行情况，以及其新闻文本所涉及的话题主要包括什么？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与新闻活动之间具有怎样的张力？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中，马克思主要思考的问题又是什么？以下研究主要参考《新莱茵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2）以及相关新近研究。

4.1 历史语境：欧洲的1848时刻

1848年革命之火最先在巴黎燃起，而后蔓延到欧洲全境。1848年2月底，德国西部发生动乱，3月的第一周动乱扩展到巴伐利亚州和东普鲁士，再下一周蔓延到包括柏林在内的德国北部地区。德国的政治分裂，导致了一系列的混乱事件（罗杰·普赖斯，2014）⁴⁴⁻⁴⁵。马克思在1848年11月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柏林的反革命》描述了欧洲革命的“循环”和“全

欧”特征,并说道“高卢雄鸡将会再一次从巴黎用自己的叫声唤醒欧洲”^①。1848年欧洲革命的“共时性”特征在意大利被称为“应时而生的王朝困境”(un vero quarantotto)(Tombs,1996)³⁵⁷。1848年革命的内涵非常丰富,众多思想溪流汇聚成江河,成为反抗现状的力量: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等等各类思潮对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制度安排的反对情绪日益强烈,其中几个显性的诉求包括宪法原则、公民权利、工人阶级权利、民族自决等。^②1848年革命几乎覆盖整个欧洲,首先从法国二月革命开始,而后鼓舞了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革命运动。1848年也是欧洲人民高度政治化的时代^③,他们借助集会、工会等社会组织展开政治话题讨论,报刊更是成为人民参与革命与现实政治的重要载体。在德国,“新闻自由”(Pressefreiheit)就是当时重要的社会议题。同时,活跃的报刊活动也促成了不同流派社会思潮的传播和相互辩论。尽管1848年欧洲革命最终是失败的,但仍具有进步意义,并对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地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例证是较多欧洲革命激进分子移民至美国,成为一支积极的力量,他们中有的人在南北战争中加入了林肯的军队(崔之元,2018)。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是共产主义同盟的领袖,也是《新莱茵报》的主编,他与恩格斯和编辑部其他知识分子在1848年革命期间密切关注并跟进各种政治事件,写下了大量澎湃篇章。

从民族国家与国际格局的角度上看,1848年革命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维也纳体系”——欧洲均势体系。在德国的语境中,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革命之间的三十多年被称为“前三月时期”(Vormärz),也称“毕德麦雅时期”,这段时期工业社会加速生产和财富积累,催生了中产阶级,整个德国的社会生活“去政治化”氛围浓厚,保守政府也鼓励民众纵情声乐,以避免产生过多有关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而在“去政治化”的主要背景下,也有一些积极的、激进的声音,例如海因里希·海涅、格奥尔格·毕希纳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大胆批判现状,主张变革。

从经济结构层面上看,1848年革命的爆发与此前较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有关,而经济危机又加重了社会危机,使得“贫困问题”“阶级问题”再次暴

^① 卡·马克思:《柏林的反革命》,载于1848年11月12日和14日《新莱茵报》第141号、第141号增刊和第142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4-22页。

^② 参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https://www.fes.de/hfz/arbeiterbewegung/epochen/revolution-1848-49>。

^③ Jürgen Herres的观点,在访谈中获得。

露在社会中。自1845年开始,庄稼歉收、工人失业、大量农村和城市人口陷入贫困,由此引发了人民的生活困境和对政府的普遍不满。1847年柏林爆发的“土豆暴动”,已经预示了经济体系患疾已久(Deme,1976)。

4.1.1 政治经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

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开创的欧洲均势状态维护了欧洲的暂时和平,也为君主政体的续存提供了客观环境和条件。当时几个主要的强权国家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包括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梅特涅政权)和普鲁士(迈克·拉波特,2019)¹²。在普鲁士,1840年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后开始清理自由派,重新建立“家长式”的统治。绝对君主制下的等级社会以血统和财产为标准决定人的尊卑,而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变化,阶级的现实实体呼之欲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成为一组显性张力。为工业和资本主义体系贡献廉价劳动力的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阶级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为众多思想家、学者研究和讨论。

4.1.2 思想潮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

19世纪欧洲生产力的迅速提升与世界市场的扩展并未能促成人口的普遍富裕,反而加重了劳动人口——无产阶级的赤贫化。12小时工作制在欧洲普遍建立,劳工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得相对多的却依然十分微薄的报酬。当时不少记者、文学家、学者开始就劳工问题展开社会调查和深度报道,例如恩格斯在1844—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如狄更斯写下的一系列反映社会现状的小说。而法国更是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汇聚于此——一个有趣的研究来自崔之元(2018)《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一文。世界上第一组集中的工人运动也发生在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掀起了全欧洲的工人运动之潮,直接激发了欧洲大陆工人的斗争意志。在欧洲,各种各样的工人协会、持社会主义主张的组织开始建立,其中就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1848年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在此之后,马克思在德国革命爆发之时便返回科隆,加入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与工人运动中。

4.1.3 新闻传播：德国的政治新闻元年

1848年被认为是德国的“政治新闻元年”,在这一年,德国的报刊发行

数量出现了一个高峰,一度达到 1700 种,但是由于 1848 年革命失败,保守主义回潮,其中的很多报刊在 1849 年便结束发行。

1848 年 3 月 3 日,由于受到有关“新闻自由”的社会舆论压力,普鲁士政府废除出版审查制度,办报活动暂时的“春天”到来。在此之前,1815 年时德国法律赋予的“新闻自由”在 1819 年被德国君主同盟借由一次暗杀事件撤回,审查制度被重新引入,320 页以下的发表内容都要受到审查,报纸和杂志必须提交当局后才可以出版。然而这样烦琐的控制机制逐渐不能应付由大规模印刷技术所赋能的报刊发行,也难以承受新闻界呼吁“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压力。1848 年 3 月 3 日,普鲁士政府废除了出版审查,所有出版物都可以获得审查豁免。3 月 17 日,新的出版法令颁布,要求出版物进行注册,日报也需要预付一笔定金;尽管存在相对“前三月时期”的自由,但出版者不得不与当局维系良好关系,以免出版物受到干涉。在动荡局势下,1848 年间发行的报刊大多是政治类报刊,报纸内容多聚焦地方的、国别的、欧洲的局面,其中不少文章就德国的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政治讨论展开。根据 MEGA 2《新莱茵报》专家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的观点,这一年的德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各类工会组织数量增加,识字的男性工人群体积极参与公共报刊阅读活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工人们聚集在酒馆等地方听报、议报。在这段时间,报纸价格普遍较高,普通的工人阶级担负不起,由此促成了多人共享一份报刊,一人朗读、多人聆听并评论的读报模式。此时,工会、报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4.2 横向比较:工人运动与报刊活动

在马克思笔下“最无聊、最压制”^①的德国,工人的自主意识也渐渐觉醒。自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开始出现大量的工人(教育)协会,发生了多次工人运动,例如 1844 年在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爆发的工人暴动。1848 年大革命期间,民主俱乐部和工人协会在德国纷纷成立。与工人运动潮相伴的是各式各样“新闻纸”的出现,其中不乏政治立场激进的报刊。报刊动员与工人运动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已经在一些研究中被提及,张莉等(2019)就指出早期工人阶级报刊的“动员报道”促进了工人阶级参与宪章运动。此

^①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 年 1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438-440 页。

外，欧洲民众的识字水平也是报纸能够盛行的重要基础。据统计，截至1848年，法国约有60%的人有阅读能力，哈布斯堡王朝约55%，俄国仅5%，而普鲁士由于国家教育传统相对完善，约有80%的民众具备阅读能力（Rapport, 2005）。

1848年前后，德国工人运动中重要的一脉力量来自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其成员。同盟盟友是曾经流亡国外的德裔激进派人士，在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参加革命运动。随着革命的发展，工人运动中的纷繁脉络也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历史片段展开梳理分析，以识别工人运动潮中相互区别的、有着不同主张和面向的支流，从而对马克思和他的《新莱茵报》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位。

大革命期间，德国报刊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除了读者群体的客观存在、技术的进步、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如上文提到，1848年普鲁士政府暂时解除了报刊检查令^①）等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理论）辩论以及政治社会动员的迫切需要，大多报刊成为相应政治组织的“机关”（organ）。

德国的左翼力量及其机关（报刊）大致分两大类，一是民主共和派。当时有影响力的共和派和社会民主派左翼报纸《报馆》（*Berliner Zeitungshalle*）也自称“民主机关报”（Organ of Democracy）（Wenicke, 2006）。相对更为激进的是《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模仿马拉（Marat）《人民之友报》命名]，这份报刊要求将大种植园划分给穷人，并号召发动阶级战争（罗杰·普赖斯，2014）⁵⁸。思想活跃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例如柏林的学生古斯塔夫·施勒费尔（Gustave Schloeffel）、记者弗里德里希·赫尔德（Friedrich Held），曾在《人民之友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呼吁民众支持其民主政治纲领（罗杰·普赖斯，2014）⁸³。

第二类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紧密关联的，总体上以社会主义为追求的激进派。与马克思、恩格斯竞争的大致还有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安德烈亚斯·戈特肖克（Andreas Gottschalk）为核心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True Socialists）；另一个是以博恩为领导的德国最大的工人组织。尽管都具备社会主义的部分要素，但这两个群体在理论主张和政治纲领等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存在较大不同。

戈特肖克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派别主张工

^① 参见威斯特伐利亚历史网络档案，https://www.lwl.org/westfaelische-geschichte/portal/Internet/input_felder/langDatensatz_ebene4.php?urlID=615&.url_tabelle=tab_websegmente。

人革命,但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重要性。戈特肖克组织成立了科隆工人协会,在巅峰时期,即1848年6月,拥有8000名成员,大约占科隆城市成年男性人数的三分之一(Schmidt, 2002; Sperber, 1991)。戈特肖克一度成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竞争对手”,他追随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的理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恩就批判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间接助长了普鲁士保守专制的一面,而这一点在现实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戈特肖克并不支持针对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运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德国的,或‘真正的’资本主义”归为“反动的资本主义”一类,因为它们单纯复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却没有意识到法国已经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条件在德国尚不存在,“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他们的理论从而成为德国封建政府对付资产阶级的武器,也由此成为一种反动的力量。^① 1848年6月,戈特肖克希望在德国建立“工人共和”(worker's republic),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不需要太多努力就可以实现,这很显然是继承了赫斯的想法。早在1843年,赫斯就告诉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当大部分人开始相信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会自然到来”(Ruge, 1846; Sperber, 1991)。马克思则认为共产主义需要阶级斗争及不断的革命才能实现。

德国影响力较大的全国性工会是由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设立的“德国工人兄弟会”(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brüderung),这是德国境内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关报是《兄弟》(*Die Verbrüderung*),主张工人们联合起来争取更好的生活。博恩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员,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流亡布鲁塞尔时期做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排字工(Nippel, 2018)⁴²,这份报纸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普鲁士发生三月革命后,博恩从布鲁塞尔回到柏林,组建并领导了“工人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der Arbeiter),还担任委员会机关报《人民》(*Das Volk*)的主编,该报经常转载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27-428页。

是,博恩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主要聚焦工人“眼前的迫切关注”,其宗旨是工人“互助”,以及民主化改革^①,因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逐渐出现分歧。甚至博恩在后来回顾时 also 说道:“如果我把自己当做共产主义者,他们要么会当面嘲笑我,要么会同情我。我再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迈克·拉波特,2019)²³⁷ 由于所持观点不同,博恩与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分道扬镳。

依据相关史料及以上分析,笔者将 1848 年德国主要民主政治行动以及相应的或独立的媒体活动进行了流派的区分和横向比较,如表 4-1 所示。

表 4-1 1848 年革命时期德国政治报刊与工会行动派别比较

政治理论	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	工人互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
核心观点	激进斗争、相信街头暴动	友爱、互助、社会改革	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	直接复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不反对普鲁士
组织/机关	《报馆》 《人民之友报》	工人中央委员会、德国工人兄弟会、《兄弟》《人民》	《新莱茵报》、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隆工人协会前期
代表人物	古斯塔夫·施勒费尔、弗里德里希·赫尔德	斯特凡·博恩	马克思、恩格斯	莫塞斯·赫斯、安德烈亚斯·戈特肖克

4.3 新闻实践：《新莱茵报》与主编马克思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 年在科隆出版,是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报,马克思任主编。参与编辑工作的有亨·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恩·德朗克(Ernst Dronke)、弗·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斐·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格·维尔特(Georg Weerth)、斐·沃尔弗(Ferdinand Wolff)和威·沃尔弗(Wilhelm Wolff)。这些编辑工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该报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份由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党报,被列宁

^① 参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https://www.fes.de/hfz/arbeiterbewegung/epochen/revolution-1848-49>.

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它也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① 报纸的编辑部位于科隆市中心，如今已被改造成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咖啡馆，其外墙雕刻着一张黑底的牌匾，上面写有“《新莱茵报》：1848年8月28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与……一同在这里从事《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这是1848—1849年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民主报刊之一”^②。1848年3月革命爆发，流亡中的马克思回到科隆，当时科隆人口大约9万，在1848年，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Stedman Jones, 2016）。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马克思与其他几位编辑一同创办了《新莱茵报》^③。《新莱茵报》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为了复兴1842—1843年发行的《莱茵报》之革命精神。莱茵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公民社会较活跃，普鲁士政权受到制衡（Herres, 2012）²。1848年革命期间该地区涌现出很多自由派领导者，他们在莱茵省办报，因为相对其他地区，他们在这里享有更多出版自由。

那么，《新莱茵报》“新”在何处呢？除了由技术带动的排版、编辑手法的进步之外，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和他团队的“新思想”和“新思路”。此时马克思尽管承担与《莱茵报》时期同样的主编职责，然而由于四年多在欧洲多地生活与研究的经历，他自身的知识体系、思想意识、价值观自然有所发展。在法国和比利时流亡时，马克思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深入钻研了政治经济学学说，在《莱茵报》时期“首次接触物质利益”后开启了更多理论上的探索。他从一个反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激进自由派知识分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者，逐渐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并对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蒲鲁东、莫塞斯·赫斯（Moses Hess）等人的思想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基本创立了唯物史观。同时，马克思也担任了诸多进步组织的领导职务，这些组织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德国民主社会等。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动因、要素，以及无产者如何推动历史演进有了明确的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

^② 原文：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Hier befand sich vom 28. August 1848 bis 19. Mai 1849 die Redakti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Unter Leitung von Karl Marx wirkten Heinrich Bürgers, Ernst Dronke, Friedrich Engels, Ferdinand Freiligrath, Georg Weerth, Ferdinand Wolff und Wilhelm Wolff an einem der bedeutendsten Blätter der Demokratischen Bewegung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③ 马克思被选举为《新莱茵报》主编的过程，几本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都有描述，可参考Stedman Jones (2016)的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或是 Nipple (2018) 的 *Karl Marx*。

判断和论述。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曾回忆到为《新莱茵报》撰稿的体验：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真是一种乐趣”。而为《新莱茵报》工作也创造了少有的令他体验到报刊发挥现实影响力的时刻：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与之对话的人。^①然而，《新莱茵报》的办报过程却是异常艰辛。报纸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但是到了月底，一个股东都没有剩下。“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没有照付”，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在1848年9月时，它已经差不多可以发行到5000份。尽管历经查封、被迫停刊等遭遇，在1849年5月，它还是有了6000订户，而《科隆日报》也只不过有9000订户。^②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部屡遭普鲁士政府的迫害。1848年5月，普鲁士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同时加紧控制《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导致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的发行虽然在形式上终止了，但是它的不屈精神将永恒鼓舞着工人们，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最后的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从政治属性上说，《新莱茵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9世纪30年代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在他们的推动下，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采用了马恩的建议，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同年年底，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由此，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诞生。直到19世纪末，这部宣言仍然是美洲和整个欧洲最牢固的国际纽带^③，而现如今，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心系无产阶级命运的人们的纽带。1848年3月初，同盟在巴黎建立了以马克思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共产党

^① 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发表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3页。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0页。

^③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96页。

在德国的要求》，并组织盟员回德参加革命。《新莱茵报》成为第一批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舆论和革命阵地。在二月革命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常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撰稿，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该报一度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陈力丹,2016a)。

《新莱茵报》的副标题“民主机关(报)”，乍一看似乎与其作为共产主义“舆论阵地”的本质存在出入，实际上，考虑到1848年革命的情况，可以如此理解这一副标题：冠以“民主”之名一方面体现了报纸在当时情境下的运行策略，为了更好地与激进民主派打成一片，其中包括报纸的赞助者；另一方面，报刊的斗争目标的确包含“民主”，最狭义的理解就是反对普鲁士专制统治，而马克思本人也是“科隆民主社会”的核心成员(实际的领导)。“民主”这个概念被包裹在马克思的双重目标中：其一是坚决反抗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其二则是工人阶级夺权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双重目标本身包含“民主”意涵。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是民主最为彻底的一种形态。从两个目标实现的递进关系上来讲，马克思早在1846年与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示，在共产主义革命来临之前，首先需要资产阶级革命(Sperber,2013)¹⁸⁰，而这也正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主要性质。

当然，正是因为双重目标的存在，《新莱茵报》本身也会遇到相互纠缠的现实状况。1848年，《新莱茵报》刊发了大量有关革命期间欧洲各地民主运动的文章，而马克思、恩格斯与以赫斯及戈特肖克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长期论争，说明了《新莱茵报》广泛的民主力量、反对普鲁士统治的立场。在后期，《新莱茵报》更多地转向关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情况。

《新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也经历了相当的思想震荡。不少研究认为《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开始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事件分析，并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贯穿于新闻书写中。辛锋、王俊勇(2018)指出，马克思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原先基于对主体性进行解读的哲学已无力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须从“高扬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扬弃。在1849年搬到伦敦后，马克思开始着手撰写《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在此文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二月革命的起因以及无产阶级公开与资产阶级决裂的第一次冲突——六月起义。在马克思看来，在法国的路易—菲利普时代，资产阶

级并非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政权，相反，国家政权只掌握在金融贵族手里，而其他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

1850年春天马克思又有时间从事经济研究，便首先着手梳理、分析最近十年的经济史。马克思根据经济史研究还做出了判断：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①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阶级这个概念开始站稳了脚跟。与之同步的则是马克思对新闻自由更加深刻的认识。新闻自由是谁的自由？马克思开始关注“泛自由论”背后的阶级问题，并开始真正思考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还应在政治和经济的范畴中付出行动。

4.3.1 《新莱茵报》的编辑与发行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专家于尔根·赫雷斯(Jürgen Herres)指出，《新莱茵报》具备全国性大报的全部特征。一期报纸有四页，宽38厘米，长48.4厘米(Herres & Melis, 2016)⁸⁸⁹。报名位于头版上端正中，正文内容分为三栏呈现。内容排版顺序如下，官方通告、社论、德国国内新闻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新闻，最后一页的末端主要发布社会类、民生类的通知、广告等。自1849年2月7日开始，报名两侧刊登报纸的发行和订阅信息。

《新莱茵报》在德国全国范围内由邮政配发，在科隆及周边则由配送员和卖报者承担递送任务，有着不错的发行量。1848年6月，该报大约有300~800的订户，最高时可以达到1000订户。恩格斯后来回忆，《新莱茵报》在1848年9月已经印出大约5000份。1849年5月，该报被查封的时候，发行量达到6000份。^②1849年1月26日，科隆的区长爱德华·冯·莫勒(Eduard von Möller)向柏林内政部门递交报告，称《新莱茵报》的发行量达到了3000份，比上一年大约增加了700份。1849年的上半年，该报发行量大幅增加。正如一份报刊评论所言，“很少有报纸能像《新莱茵报》这样在短时间内拥有如此多的订户——差不多在5000~6000份”(Herres &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80页。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26页。

Melis, 2016)⁹⁰⁰。① 《新莱茵报》的最后一期则至少印出了 17 000 份,可能达到 20 000 份(Herres & Melis, 2016)⁹⁰⁰。而《新莱茵报》的重要论战对象,莱茵地区的主流政治报刊——《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在 1848 年的发行量在 9000~17 000(或 18 000)份。与同期德国报纸的发行量进行比较(如表 4-2 所示),《新莱茵报》算得上是 1848 年革命时期德国少有的成功的民主派报刊。事实上,马克思的新闻编辑能力在他初露头角时就已显现。1842 年 10 月,24 岁的马克思成为《莱茵报》实际的主编,在他的带领下,报刊发行量一度从 600 份增长到 3400 份(1843 年年初)(Nippel, 2018)¹⁵。

表 4-2 同期德国主要报刊发行量一览②

刊 名	发行量(份)	地 点
<i>Kölnische Zeitung</i> 《科隆日报》	9000~17 000 (或 18 000)	Köln 科隆
<i>Neue Rheinische Zeitung</i> 《新莱茵报》	5000~6000, 最后一 期达到 17 000	Köln 科隆
<i>Rhein-und Moselzeitung</i> 《莱茵—摩泽尔日报》	1000~1300	Koblenz 科布伦茨
<i>Trier'sche Zeitung</i> 《特里尔日报》	1000~1300	Trier 特里尔
<i>Rheinische Volkshalle, Organ des rheinischen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i> 《莱茵人民大厅,莱茵政治天主教机关报》	2100(1848 年年末) 2700(1849 年年初)	Köln 科隆
<i>Frankfurter Journal</i> 《法兰克福日报》	12 000(1848 年年末)	Frankfurt 法兰克福
<i>Berlinische Zeitung</i> 《柏林日报》	7400(1849 年年初)	Berlin 柏林
<i>Berlinische Nachrichten</i> 《柏林消息》	6200	Berlin 柏林

① Edited by Jürgen Herres and François Melis, MEGA ②. I/7. Apparatus [M]. 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6: 900. 原文引自: W Köln, 18 Mai. Unsere Regierung... In: Frankfurter Journal. Nr. 121, 21. Mai 1849: 2.

② 数据来自 MEGA ②. I/7. Apparatus [M]. 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6: 900. 附注 179。

续表

刊 名	发行量(份)	地 点
<i>Neue Preußische Zeitung</i> 《新普鲁士日报》	3800	Berlin 柏林
<i>Deutsche Reform</i> 《德意志改革》	1800	Berlin 柏林

《新莱茵报》发行至德国全境,很多文章被其他报刊转载。工人领袖博恩在柏林创刊的报纸《人民》(*Das Volk*),有近三分之一的文章来自《新莱茵报》。1848年6月至8月底,这份报纸一直是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们可以在饭馆、读书会、读书俱乐部和公共读书室阅读这份报纸。该报的编辑之一,威·沃尔弗(Wilhelm Wolff)经常参与科隆民主社会的集会,在集会上,工人组织提供每周政治报告,他则经常向大家朗诵《新莱茵报》的文章(Herres & Melis, 2016)⁹⁰¹。然而想要读懂这份报纸并不是一件易事,报纸主要聚焦政治新闻,复杂的用词和艰深的理论对于当时的广大工人和匠人(手工艺人)而言确有理解上的难度。科隆工人协会认为这份报纸“曲高和寡”,需要一个翻译(Herres & Melis, 2016)⁹⁰²。购买报纸对工人来说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新莱茵报》报名左侧的标注,1848年6月创刊时一个季度的订阅价格在科隆当地为1塔勒15格罗申银币(1 Thlr. 15 Sgr),在普鲁士其他地方价格为2塔勒3格罗申银币9芬尼(2 Thlr. 3 Sgr. 9 pf)^①;到1849年4月时为1塔勒7 1/2格罗申银币(1 Thlr. 7 1/2 Sgr),在普鲁士邮局价格为1塔勒17格罗申银币(1 Thlr. 17 Sgr)^②,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周的工资(Nippel, 2018)⁵¹。

4.3.2 作为报刊主编和革命者的马克思

《新莱茵报》是一份政治类报刊,为当时的识字群体和关心政治的民众提供每日的时政分析和评论,关注的范围主要在欧洲。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主编时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此前多年的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经历为他在更广的天地发挥更大的价值准备了重要条件。马克思一人兼任《新莱茵报》

^① 例如《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的报头,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nn_nrhz001_1848?p=1.

^② 例如《新莱茵报》1849年4月9日的报头,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nn_nrhz264_1849?p=1.

的主编和社长,不仅需要组织欧洲各地通讯员的新闻报道工作、统筹报刊的整体内容和编排结构,还要从事筹款工作,确保报纸的正常出版发行,甚至马克思本人也垫付了很多资金。马克思 1848 年 8 月和 9 月到柏林和维也纳、1849 年 4 月到不莱梅和汉堡进行游说、筹资,其中 1848 年 9 月筹得了来自波兰籍人士的捐款(Herres, 2006)¹⁷。编辑团队成员各施其能、各尽所长。马克思本人主要专注于宪法问题、普鲁士政府内政和外交政策,欧洲时政如巴黎的六月革命,以及政治经济学问题如劳动分工等(Herres & Melis, 2016)⁸⁹³。恩格斯擅长政治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由于曾经在柏林服役的经历,他常被称作“The General”(将军)(Sperber, 2013)¹³⁸。格·维尔特则负责文艺专栏。《新莱茵报》也组建了分布于欧洲各地的通讯员网络。1848 年夏季,恩格斯亲自参与了几场武装起义,而后迫于当局追捕,遂流亡瑞士,担任了三个月的《新莱茵报》驻瑞士记者。前文提到的斯特凡·博恩是《新莱茵报》的驻柏林记者。如陈力丹(2020)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报纸每篇文章的“讯头”——不同的符号来考证作者。

马克思的文章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文学性,展现了其在历史、文学、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写起新闻稿来不像个记者,“其他人两个小时能写完,而马克思则要一坐一整天,似乎要解决一个高深的哲学问题,他总是不断地修改、再修改”^①(Herres & Melis, 2016)⁸⁹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文章时往往也要工作到凌晨。英国宪章派领袖、工人运动活动家、《北极星报》编辑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将两人的合作模式描述为一套“哲学性的体系”,“每天都要写到凌晨三四点”^②(Herres & Melis, 2016)⁸⁹⁴。

报社的日常工作中,也时不时上演马克思笔下的“劳工问题”,《新莱茵报》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每周出版 7 次,而后从 8 月开始,每周出版 6 次,这很大程度上是排字工和印刷工人争取的结果(Nippel, 2018)⁴⁸。

马克思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是科隆民主社会的成员,在戈特肖克被捕入狱后成为科隆工人协会的主席,该组织与博

^① Edited by Jürgen Herres and François Melis. MEGA². I/7. Apparat[M]. Berlin: De Gur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6:893. 原文引自: Stephan Born: Erinnerungen eines Achtungsdvierzigers. Hrsg. von Hans J. Schütz. Berlin/Bonn 1978.

^② Edited by Jürgen Herres and François Melis. MEGA². I/7. Apparat[M]. Berlin: De Gur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6:894. 原文引自: George Julian Harney an Engels, 20 März 1846. In MEGA² III/1:523.

恩领导的德国工人兄弟会有着密切联系。

马克思对于报刊在革命活动中的角色有着深刻认识：报刊需要干预日常的、基础的、个体的事件，从而动摇旧制度的根基。《新莱茵报》在1848年7月5日第35号发表的题为《逮捕》一文被当局指控侮辱了检察官和宪兵，有关审讯于1849年2月7日举行，马克思在法庭中发言道：

至于我本人，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却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牺牲。但是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此外，诸位先生，直接同个人、同活的个体及其个人生活发生接触的下级政权机关和社会权力机关是奴隶制度这一建筑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作斗争是不够的。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依据审讯记录，在马克思发言后，听众们便发出叫好声，而当被告——《新莱茵报》的编辑团队被宣判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①。

到了1848年秋季，马克思已经成为在科隆、莱茵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人物，《新莱茵报》也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马克思并未选择进入国家政治系统，他的一些同辈如卢格是当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German National Assembly）的议员，而马克思在特里尔的同学路德维希·西蒙（Ludwig Simon）则在柏林的国民议会（Berliner Konstituierende Versammlung, Prussian Constituent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的发言》，载于1849年2月14日《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62-285页。

的词云直观展示出马恩文章的关注重点。除了报刊名外，马恩文章的标题中最高频出现的概念包括革命、协议、资本、劳动、工资、集会、起义、新闻、政策、法律、国家、报刊。最常涉及的地域范畴如下，城市一级有科隆、巴黎、维也纳，省一级有莱茵省，国家一级有普鲁士、意大利、丹麦。

在《新莱茵报》的新闻工作促使马克思深度参与甚至是推动1848年欧洲革命的民主进程，同时也成为他开展进一步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动因和延伸。这一阶段，马克思十分重视工人问题，资本与劳动这一组关系成为其新闻书写的关键框架。《新莱茵报》是马克思、恩格斯投入“现实政治”的主要媒介，无论是莱茵省的地方政治，还是以位于法兰克福、柏林两个城市的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新莱茵报》对革命时期的民主运动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跟踪报道、评论与理论分析。1848年3月开始，柏林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暴动，《新莱茵报》一方面支持民主街头运动反对普鲁士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会遗憾于这些运动的“犹豫不决”和不彻底性。尤其在1848年8月之后，《新莱茵报》对柏林的民主俱乐部“自说自话”的空洞特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Wenicke, 2006)¹⁹³⁻²²²。马克思发表在1848年11月3日《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讽刺了1848年10月末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表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贫乏的思想和感情。”^①在1848年11月12日和14日发表的三篇连载文章《柏林的反革命》中，马克思更是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的角色和本质：

资产阶级是很愿意通过友好的协商把封建王国变成资产阶级王国的。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封建党派的有辱资产阶级尊严的徽志和封号以及和封建所有制相关联的、破坏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收入之后，它是很愿意同封建党派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奴役人民的。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

^① 卡·马克思：《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载于1848年11月3日《新莱茵报》第133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527-530页。

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

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①

文章最后,马克思提出明确的建议:“拒绝交税”,“饿死王权”。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历史进程中曾发挥积极作用,但最终不能克服阶级属性给予它的障碍。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独立性也在不断成长。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没有成熟之前只能组成资产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②

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在革命中逐渐展现的局限性,《新莱茵报》更加主动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六月革命期间,《新莱茵报》就已经明确指出共和派和民主派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并对工人起义表达了坚定、强烈的支持态度。例如马克思写作的《六月革命》一文批判了虚假的“博爱”观点:

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他还用生动的例子,如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医学系的学生在革命期间的表现,描述了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派

^① 卡·马克思:《柏林的反革命》,载于1848年11月12日和14日《新莱茵报》第141号、第141号增刊和第142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6页。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97页。

的或“改革报”(Réforme)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受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①

《新莱茵报》1849年1月5日发表的文章《资产阶级的文件》(MEGA 2 编译小组考证这篇应为马克思与格·维尔特的合作文章^②)摘取了科隆市城市建筑工人在入职前必须签署的“工人手册”的部分内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普鲁士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

根据第五条,凡是迟到十分钟以上的人,都要受到半个工作日没有工做的处分。处分和过错是多么不相适应啊!你们迟到了整整几个世纪,而工人却不能在六点半以后迟到十分钟,迟到了就得失去半个工作日?

文章结尾说道,从这个模范法律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如果当了政,会赐给人民什么样的宪章。^③

1849年4月5—11日的五篇连载文章《雇佣劳动和资本》对劳动与资本这一对紧张关系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精辟阐述。这篇文章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1847年年底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以及1848年9月在维也纳的演讲(Nippel, 2018)⁵⁵。《雇佣劳动和资本》一文以问答的形

^① 卡·马克思:《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53-157页。

^② Edited by Jürgen Herres and François Melis. MEGA ②. I/8. Apparat [M]. 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20:944.

^③ 卡·马克思和格·维尔特:《资产阶级的文件》,载于1849年1月5日《新莱茵报》第187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80页。

式阐释了几个主要问题：(1)工资的问题；(2)商品价格的问题；(3)工资和利润的相互关系；(4)生产成本与工资的关系——机器与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5)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等等。这篇文章对于识字工人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论启发意义，它回应了一个至今可能还令人困惑的问题：资本家与工人是不是肝胆相照、一荣俱荣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利润的增长与工人工资的增长永远是不对等的，因此造成了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努力唤醒沉睡中的工人，同时为即将失去仅有的一点财产的“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作出提示，他们随时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补充。

于是，工人阶级的未来命运、劳资矛盾的内在逻辑在《新莱茵报》的议程主线中逐渐浮现出来。担任《新莱茵报》主编的这段时间，马克思将他自攻读博士以来有关国家问题、法律问题的思考以及自1844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积累尽情地发挥了出来，这也为他此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马克思新闻工作和学术工作的重点依旧落在政治经济学范畴。《新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旨在为1848年革命作出理论总结。而在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将主要的学术精力贡献给了大部头《资本论》。

《新莱茵报》在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最后一期，发行量达到17 000份，“工人阶级的解放”(Emanzipation der arbeitenden Klasse)成为它留给世界的绝唱，见图4-2。

作为革命报刊《新莱茵报》实践延续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文章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等，以及马恩的国际时事评论和书评。威·沃尔弗、魏德迈等革命人士也为该刊物撰写过文章。这份杂志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主要性质，在革命理论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透彻研究了法国的社会结构以及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作为主编的最后一次新闻出版实践。《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的诸多作品已经成为经典篇章，并在走向历史深处的过程中沉淀为马恩有关1848年大革命论述的理论精华。

图 4-2 《新莱茵报》最后一期首页^①

4.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聚焦 1848 年革命时期《新莱茵报》与作为主编的马克思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新莱茵报》等一手史料的爬梳与考证，在深入分析 1848 年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德国新闻传播业概况的基础上，描绘了《新莱茵报》在革命洪流中的位置，包括该报纸创立、编辑与发

^① 参见 https://museenkoeln.de/portal/bild-der-woche.aspx?bdw=2019_19.

行的基本状况,报刊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和议程变迁,以及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章也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与同时期、同境其他报刊和工会的活动做比较,指出马克思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诉求方面的彻底性。《新莱茵报》集结了当时关心民主进程、关心工人命运的知识分子——其中,编辑团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这些编辑人员同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此外也有驻柏林、苏黎世等欧洲各地的通讯员为科隆发来实时消息。本章也论述了《新莱茵报》论述重点的转向:从民主运动转向工人运动。

劳动与资本这一组紧张关系是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新闻书写着力处理的关键框架,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记者马克思著书立说的目标与使命。尽管受到客观社会结构的限制,工人受教育水平与报纸的文字表达之间还存在“沟壑”,大革命期间有多少工人直接受到《新莱茵报》影响尚待考证,但借由工人协会、民主协会、读书俱乐部等传播平台和路径,马克思和他的团队成为欧洲大革命时期一支立场坚定、观点明确的思想流派,他们通过新闻报刊实践与现实政治和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报社旧址牌匾上的文字所言,“《新莱茵报》是1848—1849年大革命期间重要的民主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完成的关键环节,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在这一进程中的双重角色特征。在与各怀政治主张的同行者的论辩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得到了阐发。欧洲革命期间与马克思相“竞争”的诸多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支流,也为人类政治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贡献了多样见解。尽管1848年革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去政治化的毕德麦雅时期后,这一时期的德国依然再次迎来了百家争鸣的政治“大时代”。

作为社会主义舆论家,马克思通过活跃的新闻工作深度参与到1848年革命进程中,而“记者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新闻活动带来的影响又至为深远。《新莱茵报》对事实的记录和评论集结成为研究1848年革命的重要参考,它们被纳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也成为下一阶段“《纽约论坛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欧洲革命展开回顾和分析的重要参考读本。这段时期的新闻评论、学术篇章、理论思考也漂洋过海,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的传播。